

帝王還魂—— 明代建文帝流亡敘事的衍異

劉瓊云*

本文從歷史記憶與敘事的角度，重新檢視兩部長期被視為「偽史」的晚明文本《致身錄》及《從亡隨筆》，立論在真偽的層次之外，此二書衍生出的種種周邊現象(包括其內容、形成、在晚明士人階層中的流行、與當時「靖難」言說語境及士人心態之間的關係等等)，其實牽涉未能明言的歷史在私人著述中隱遁、浮現、改造、再生的過程，也牽涉後人對前代歷史事件的收編、重構與再詮釋。這兩部就史實考證的目的而言價值甚低的文本，對於我們探究歷史記憶與文學敘事之間的互動，卻不失為一有效個案。本文首先分析萬曆朝所上追諡建文及其忠臣的奏議、明末清初其他「靖難」野史序文，以及《致身錄》崇禎二年、康熙八年兩版本豐富的序跋文字，論證《致身錄》、《從亡隨筆》所述在晚明的流行，可說是當時政治語境、讀者反應及商業文化共同運作的結果。其次，筆者追溯明中葉以來建文出亡及其節臣隱遁兩條原本分別的敘事脈絡之演化，以至在《致身錄》與《從亡隨筆》二書中合流的過程。最後，聚焦於二書內容本身，分析其敘事擄獲多數晚明讀者的要素何在。文末「餘音」一節則藉清初傳奇《千忠錄》為例，略示建文流亡想像在清初既血腥又纏綿的兩極轉化。

關鍵詞：《致身錄》、《從亡隨筆》、建文帝、歷史記憶、敘事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言

晚明萬曆年間問世，記述建文帝及其從亡節臣浪跡中國西南的《致身錄》、《從亡隨筆》(下文或簡稱《致身》、《從亡》)二書，以其篇幅之短，引發爭議之多，在當時和後世影響力之大，堪稱一奇特現象。兩書歷來得到的關注並不少。《致身錄》問世不久，沈德符(1578-1642)即指其為偽撰。¹之後有錢謙益(1582-1664)作〈致身錄考〉，提出「十必無」，斷定書中所言史仲彬從亡建文帝事之不可信；復作〈書致身錄考後〉，認為《從亡隨筆》乃「踵《致身錄》之偽而為之者也。」²之後清初修纂《明史》，對於建文書法，包括其是否「遜國」，從亡敘事中的要角程濟(14世紀末-?)之傳或存或去，都經過反覆辯論再三修改。³胡適亦撰有一篇短文，對比此二書與《明史》中的記載，評論「這完全是小說口吻，全無史料價值。」⁴這些論辯環繞著二書內容的「真偽」，一旦立論當中多有不實之處，問題便可劃下句點。

然而，倘若我們從歷史記憶與敘事的角度重新檢視這兩部文本的內容及其形成、在晚明士人階層中的流行、與當時「靖難」言說語境及士人心態之間的關係，則從《致身》、《從亡》二書衍生出的種種周邊現象，其實牽涉未能明言的歷史在私人著述中隱遁、浮現、改造、再生的過程，也牽涉後人對前代歷史事件的收編、重構與再詮釋。換言之，這兩部就史實考證的目的而言價值甚低的文本，對於我們探究歷史記憶與文學敘事之間的互動，卻不失為一個有效的個案。

此二書何以得與「記憶」相關聯？事實上，晚明以來針對二書「辨

1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建文君出亡〉，頁9-11。

2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23，〈書致身錄考後〉，頁758。

3 包遵彭，〈明史編纂考導論〉，頁1-8；孟森，〈建文遜國事考〉，頁1-14。

4 胡適，〈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跋崇禎本《遜國逸書》殘本〉，頁19-23。

偽」的言論書寫之多，恰也反證了其流行之廣，讀者接受之深。沈德符批評此書：「一時不讀書不諳事之人，間為所惑；即名士輩，亦有明知其偽，而哀其乞憐，為之序論，真可駭恨！」⁵沈氏義憤的語氣透露出受《致身錄》「所惑」之人，當不在少數；且為此書作序者，大有當時位高名重之輩。也確實，根據現存崇禎二年本《致身錄》，當中書序作者包括錢龍錫(1579-1645)、⁶陳繼儒(1558-1639)、陳懿典(萬曆壬辰 1592 進士)，並附有陶奭齡(1571-1640)題詩。⁷錢士升(1575-1652)於崇禎末年集《從亡》、《致身》、《黃陳冤報錄》、《拊膝錄》四者為《遜國逸書》，⁸其所作〈史翰林致身錄序〉言：「嗟乎！諸公姓名，湮沒二百三十餘年矣！而今從名山滄瀾之餘，忽現光彩，……一段精氣徹清虛，貫金石，而不容泯滅如此」，欣幸之情可見。⁹錢謙益的考辨，與南科臣歐陽調律(萬曆庚戌年 1610 進士)上書為《致身錄》主角史仲彬「請諡立祠，附方、鐵諸公之後」之舉密切相關。¹⁰潘耒(1646-1708)的考辨則針對清初吳江邑紳諸生薦請史仲彬入祀鄉祠之舉。¹¹由此可見，《致身錄》在當時不只是一部被靜態閱讀的文本，還引發實際的

5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1，〈建文君出亡〉，頁 10。

6 錢龍錫，字稚文，號機山，松江華亭人。萬曆卅五年進士，崇禎初起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7 陶奭齡，《賜曲園今是堂集》，卷 10，〈讀史清遠翁致身錄感而有述〉，頁 33b。

8 錢士升，字抑之，號御冷，晚號塞菴，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殿試第一，受翰林修撰。崇禎中累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9 錢士升輯，《遜國逸書》，〈史翰林致身錄敘〉，頁 2a。《致身錄》在晚明另被收入馮可賓所輯之《廣百川學海》及陶珽《說郛續》。

10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 23，〈致身錄考〉，頁 755。

11 列名薦牘之首者為潘耒同鄉舊交徐鉉。徐鉉，江蘇吳江人，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潘耒，《遂初堂文集》，卷 5，〈與徐虹亭書〉、〈再與徐虹亭書〉，頁 29a-34b。

社會效應。平面文字陳述的歷史記憶引動、介入官方與地方祠祀的公共記憶形式。更重要的是：之後所出的建文朝野史、地方志乃至文學文本，亦受《致身》、《從亡》二書之說影響。清初知名傳奇劇作《千忠錄》敘述建文流亡故事，即以兩書敘事者史仲彬、程濟為主角。清初野史、地方志的記載中，建文、史仲彬、程濟及其他從亡諸臣依然活躍，清末餘緒仍存。¹²及至今日，考辨建文流亡行跡，歷歷舉證建文落籍之處的學術非學術言論仍多。¹³

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時人後人不察，缺乏實證知識誤信傳聞的結果。但筆者認為，建文流亡敘事自晚明以來的鋪張漫衍，實更牽涉歷史與記憶既分且合相互曲折的作用，以及所謂「野史」、「偽書」與文學敘事若即若離的關係。相較之下，《致身錄》的真偽也許是個較為簡化的問題；其周邊、背後牽涉的相關言說，政治、社會、心理因素，以及歷史、傳說和記憶流動曖昧的轉化，是更複雜而有趣的現象，也是本文關注的核心。考慮《致身》、《從亡》二書在明清之際流行的程度，所建構的建文帝流亡想像在後世持續的影響，以及接受其說的讀者之眾身份之高，辨別二書真偽之外，我們還可以，甚至必須進一步追問：《致身》、《從亡》書中的敘事對於當時讀者的吸引

¹² 野史之例如周鑑(崇禎元年進士)《遜國忠紀》、曹參芳《遜國正氣記》、趙士喆《建文年譜》等。地方志如《(道光)貴陽府志》，卷33、《(咸豐)安順府志》，卷9、《(同治)臨川縣志》，卷44、《(光緒)浪穹縣志略》，卷11、《(光緒)廣西通志輯要》，卷12等。

¹³ 類此之例頗多，此處僅列數例：徐作生，〈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證〉，頁24-29。張一鳴，〈明建文帝下落「新說」質疑——與徐作生同志商榷〉，頁44-49。陸宏輝，〈揭開明代歷史上的一個大謎——從地方志看建文帝失位後的行跡〉，頁92-95。管維良，〈地方志是建文帝出亡的歷史見證〉，頁80-85、95。黃全安、蒙潘孫，〈明代建文帝駐足廣西橫縣寶華山有關史實考據〉，頁42-45。楊知秋，〈建文帝出亡雲南新證〉，頁108-111。何歌勁，〈建文帝落籍湘潭〉。

力究竟何在？徐鉉(1636-1708)為《致身錄》辯護言：「忠義美事，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¹⁴顯宦名士們明知此作大有不實之嫌，卻以「忠義美事」為存錄之由，可見問題的核心較不在眾人真偽不分，而是真偽之外，接受二書與否，還牽涉道德價值的判準；再進一層看，亦關乎士人身處的晚明政治、社會環境，「靖難」事件在當時的論述脈絡，個人對此一歷史事件的看法與情感投射。那麼，晚明的政治、社會氛圍與《致身》、《從亡》的文本如何交互作用以致書中的建文流亡敘事成為時人有意無意選擇之下偏好的歷史記憶？

本文從三方面探索上列問題。首先，透過萬曆朝所上追諡建文及其忠臣的奏議、明末清初其他「靖難」野史序文，及筆者所見《致身錄》崇禎、康熙兩版本豐富的序跋文字，筆者試圖分析晚明關於「靖難」言說的語境，特別是這些奏議、序跋如何淡化永樂、建文原本的衝突關係，並轉化乃至彌合「靖難」歷史創傷的種種言說策略。除了晚明政治語境及士人讀者的《致身錄》閱讀反應，此書崇禎、康熙二本的對照，亦足以呈現其編者在當時打造此作為文化商品以利行銷的方式。換言之，《致身》、《從亡》所述在晚明的流行，可謂當時政治語境、讀者反應及商業文化共同運作的結果。筆者此處所進行的分析，著重在呈現建文流亡敘事在晚明「定型的環境」。然而這個故事並非在晚明憑空而出，《致身》、《從亡》的敘事細節其實是匯集、增刪並重組了明中期以降，對於建文出亡及其隱遁節臣種種來源不一的說法和紀錄，主要見於早期的建文野史及筆記材料。若非這些既存的傳聞和記述，如《致身》、《從亡》之書未必有足夠的基礎材料以資其擴充整編；晚明讀者對於書中所描繪的從亡細節也未必如此傾心，不可自己。因此第二部份，筆者將追溯明中葉以來建文出亡及其

¹⁴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5，〈與徐虹亭書〉，頁29b。

節臣隱遁兩條原本分別的敘事脈絡演化，及至在《致身》、《從亡》二書中合流的過程，試圖呈現建文流亡的歷史記憶在明末定型之前「醞釀的過程」。這也是期望在一般僅從外緣因素(包括萬曆朝「平反建文忠臣」的官方政策、地方聲譽競爭、商業出版獲利等)解釋兩書流行的做法之外，嘗試更細緻的處理方式。審視二書問世時的環境及之前相關記述的層衍之後，本文將聚焦於二書內容本身，分析其敘事擄獲多數晚明讀者的要素何在，立論二書結合流亡君主與隱遁節臣兩條敘事線索，構築出一幅君臣如友、重情尚義、全身全德的理想圖像，其於君臣關係緊張的晚明政治現實，及士人調和永樂建文對立的歷史位置以為後者「正名」的努力，實為對應而折照的關係。最後，則藉清初傳奇《千忠錄》為例，略示建文流亡想像在清初既血腥又纏綿的共時兩極轉化。

最後必須說明兩點：第一，關於《致身》、《從亡》二書的真偽問題，歷來考辨已多，且屬考證史學的範疇，不在本文關注的核心。歐洲思想與文化史學家拉卡帕拉(Dominick LaCapra)分判記憶與歷史之別時如此陳述後者的作用：「歷史的作用在於以批判的方式質疑、檢驗記憶，從而具體指出當中哪些部份是可驗確實的，哪些部份雖逸出事實但不減其重要性。」¹⁵考證研究已指出二書中「不實」及「不能證實」之處，本文則以真偽問題的終點為另一起點，試圖探索以理解偽造、壓抑、置換種種「逸出事實」之歷史記憶背後可能隱含的訊息。第二，自哈布瓦奇(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提出「集體記憶」概念以來，「記憶」在個人、族群、國家種種層次上的複雜運作在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等領域都得到相當關注。¹⁶本文構思的路徑從《致身》、

¹⁵ 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Memory after Auschwitz*, p. 20.

¹⁶ Maurice Halbwachs, Lewis Coser trans., *On Collective Memory*. 西方自二十世紀中對歷史與記憶研究持續不墜的興趣，與學者和文化工作者試圖探索、理解此世紀重大戰亂留下的創傷經驗息息相關。關於西方近年集體記憶理

《從亡》二書的流行現象開始，從而觸及歷史記憶議題，本質上仍以明清文學文化為關注核心，故而不擬，也無法直接回應不同學門中積累有年的記憶理論與研究成果。但也正因文中所論乃中國傳統中一個歷史記憶成型的前現代個案，對於拓展歷史記憶問題的思考向度，或可有所補充。再者，本文勾勒建文流亡記憶成形的過程，方法與材料上偏重於相關敘事文本的細讀。考慮明末清初時期無論敘述歷史、記憶、抑或歷史記憶，主要皆仍以文字為媒介，透過細繹章奏、野史、筆記、序跋之作以窺求其士人作者之心態，當不失為一可行之徑，或許也是文學研究者對於歷史記憶問題在研究方法上尤能著力之所在。

二、再探《致身錄》現象

《致身錄》的出現和萬曆年間為建文冤案平反的聲浪及實際作為有關。¹⁷神宗萬曆初，下詔表彰建文忠臣；萬曆四年，特為表彰遜國諸臣的表忠祠，建立於南京。萬曆十二年(1584)，後來《建文朝野匯編》的作者御史屠叔方，以建文忠臣苗裔既已蒙恤錄，請釋革除忠臣外親，也為神宗採納。¹⁸萬曆十七年(1589)汪應蛟(萬曆甲戌 1574 年進士)、湯顯

論研究發展的精要評述，參見 Wulf Kansteiner, "Finding Meanings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pp. 79-197. 中國研究方面，參見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為例〉，頁 40-49；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另外，從文學角度對於明清劇作中歷史意識，包括歷史記憶的討論，參見王瓊玲，〈明末清初歷史劇之歷史意識與視界呈現〉。

¹⁷ 萬曆朝之前對「建文問題」的處理和私家建文野史的撰著，亦有其長遠歷程，然不在本文論述範圍之內。意者可參考吳振漢，〈明代中葉私修國史之風探析〉，頁 1-21；吳德義，〈建文史學編年考〉。

¹⁸ 屠叔方，《建文朝野匯編》，卷 20，頁 7b-16a。《明神宗實錄》，卷 146，萬曆十二年二月己巳條，頁 6-7。

祖(1550-1616)等人為方孝孺立碑，¹⁹廿三年(1595)准復建文年號。朝廷既肯定建文忠臣的節義，自然鼓勵了建文朝史的書寫，朝臣文人下一步即希冀神宗能下詔為建文帝立紀。萬曆廿二年(1594)開館纂修本朝正史，擔任修撰的焦竑(1540-1620)上疏請求為建文、景泰立紀。²⁰之後余繼登(1544-1600)亦上疏請求別立〈少帝記〉，²¹然而神宗終究未准，僅同意「以建文事迹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號。」²²

無論如何，萬曆表彰建文忠臣之舉，已使得為建文忠臣立傳、為建文朝記史成為名正言順之事。儘管神宗最後並未同意為建文單獨立紀，朝臣文士對此的冀望，仍促使他們持續投入記述建文朝史的工作，期待未來一朝「倘若」政策改變，其著作便可貢獻於朝廷協助修史之需。若不然，以私家著史流傳，這類記述無論在道德教化、地方認同、乃至於閱讀體驗上，亦有其實際作用。首先，諸臣為建文平反的疏奏中，屢屢提及「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²³革除罪臣經朝廷正統化為殉難忠臣，其義烈行舉於是取得官方認可的正確意涵及道德價值，其事蹟得作為有益風教之德性楷模接受記述、稱揚與傳播。其次，建文忠臣的祀立，不僅涉及普遍意義上的道德示範，還有地方認同意識乃至競爭。據戴彼得(Peter Ditmanson)所

¹⁹ 汪應蛟，〈明方先生墓碑記〉，收入姚屢旋等輯，《遜志齋外記》，卷1，頁50a-51a。

²⁰ 焦竑，《澹園集》，卷5，〈修史條陳四事疏〉，頁8a-11a。萬曆廿五年(1597)宮中失火，燒燬文稿資料，纂修本朝正史一事未曾恢復。

²¹ 余繼登，字世用，號雲衢，交河人。萬曆五年進士，歷禮部侍郎攝部事。

²² 《明神宗實錄》，卷289，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庚午朔條，頁6b。

²³ 例如汪宗伊，〈應天府奉召建表忠祠碑銘〉，收入錢士升，《皇明表忠記》，頁1a。屠叔方，《建文朝野匯編》，卷20，〈廣東道監察御史屠叔方萬曆十二年上書〉，頁8b。。

論，十五世紀後半，復集建文死難者之作並記述其事蹟的努力，一開始便是死難者同籍鄉紳與地方官員合作的模式。²⁴至萬曆朝，建文忠臣的奉祀及其事蹟細節的流傳已在地方大眾的想像中生根發葉，與地方認同與優越感緊密聯繫。另外，此時的記述也顯示出一種傾向：偏好描述建文忠臣遭刑求、處死和自殺的駭人過程與聳動細節。此與晚明縱情的普遍文學風氣又相呼應。戴氏甚至以「道德政治性情色」(moralistic political pornography)比喻，凸顯這類文字對於描繪人體的興趣。²⁵

儘管戴氏文中對於萬曆朝的情況相對而言著墨不算多，但他的觀察提出了幾個有用的觀點，供我們更全面地理解像《致身錄》這樣的一部著作。除了「偽史」以外，這部書作為文化產品還有幾點更深層的意義。在最現實的層次上，《致身錄》一書，確實可能有沽名釣譽以求光耀門第之嫌。神宗下詔表彰建文忠節並對其苗裔厚加恤錄之後，不乏遺族貿然出現或真假難辨之事。例如黃子澄的後人，在當時便有爭議。²⁶《致身錄》的情況又更為複雜。《致身錄》所宣稱的記述者史仲彬確有其人，活動於元末明初。²⁷據康熙八年史仲彬十一世孫史在相所編輯《致身錄》當中「致身錄板行」的記錄，此書最早的幾個版本依序刊行於萬曆己未(1619，有秣陵焦竑序)、萬曆庚申(1620，有松江孫應昆序并詩)、泰昌庚申(1620，有松江王廷宰序，同年另一刻有史仲彬八世孫史叔成跋)、天啓辛酉(1621，有九世孫史冊釋附并跋)、天啓壬戌(1622，有九世孫史兆斗五跋六攷)。第一版中的焦竑序，錢謙益及潘耒已言其為偽託，

²⁴ Peter Ditmanson, "Venerating the Martyrs of the 1402 Usurpation: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p. 126.

²⁵ Peter Ditmanson, "Venerating the Martyrs of the 1402 Usurpation," pp. 153-154.

²⁶ 此事見 Peter Ditmanson, "Venerating the Martyrs of the 1402 Usurpation," p. 152. 另見王世貞，《弇州續稿》，卷 40，〈改黃太常墓序〉，頁 13a-15b。

²⁷ 史仲彬事蹟可見於其曾孫史鑒，《西村集》，卷 8，〈曾祖考清遠府君行狀〉，頁 19b-23a；吳寬，《家藏集》，卷 70，〈清遠史府君墓表〉，頁 3a-5b。

筆者據所見材料評估亦同意此說，猶待下文詳述。

此外，上列諸板行確實呈現出鄰近的地域性。秣陵(南京)、松江與史仲彬、史叔成籍貫江蘇吳江，史兆斗籍貫長洲都在江南一帶。²⁸而《致身錄》的刊行，亦明顯可見宗族合作延續的情況。從晚明史氏八世、九世孫到康熙八年十一世孫史在相，不僅持續出版此書，更不斷擴充內容，企圖穩固此書的價值，以辯駁當時學者以此書為偽史之說。筆者目前得見最早的《致身錄》版本為史兆麟編訂的崇禎二年本，此本大致可分為五部份：第一部分是序文，以錢龍錫〈致身錄序〉為首，焦竑〈致身錄小引〉(即〈致身錄序〉)次之，接著是陳繼儒、陳懿典與喬拱璧之序作共五篇。第二部份是《致身錄》正文；明末以來不少叢書彙編(包括《遜國逸書》、《廣百川學海》、《遜敏堂叢書》)所收之《致身錄》即是單取此一部份。第三是「附編一」，收「清遠公〔史仲彬〕詩詞」凡四首，並註明出處為《吳江縣志》。第四部份「附編二」為「諸名公詩文」，其中包括官宦名士為史仲彬所作的墓表、行狀，以及就《致身錄》所記史仲彬事有感所題之詩文。最後第五部份「跋致身錄後」，選用的是史冊記為於泰昌改元冬季所撰之跋文。²⁹

與此本相較，康熙八年本中序文從之前的五篇增至十一篇，撰者除之前已見的焦竑、陳懿典、陳繼儒、錢龍錫外，另加上了王廷宰、³⁰李日華(1565-1635)、李維楨(1547-1626)、文震孟(1574-1636)、張溥(1602-1641)及錢士升等十多人。清初潘耒曾指出這一長串名卿顯宦當中，至少李維

28 史兆斗事蹟可見於汪琬，《堯峰文鈔》，卷34，〈史兆斗傳〉，頁14a-15b。其記史兆斗：「為諸生，不得意，即棄去力學於古，尤博通前明典故。……當其少時，士大夫已爭容之矣，性尤喜蓄書，所購率皆秘本，或手自繕錄，積至數千百卷。」

29 史兆麟編訂，《致身錄》，崇禎二年刻本。

30 王廷宰，字毗翁，號鹿柴，松江華亭人，明末貢生，明末清初詩人。其事可見於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19，頁35a-36b。

楨之序文應屬偽託。³¹之後除正文、與崇禎二年本類似的史仲彬詩詞、行狀、名士題辭題跋外，另有「惠宗讓皇帝御製文」，是託言建文帝贈恤史仲彬之文。「致身錄恩恤」收錄自天啓二年至崇禎十七年，南京戶科歐陽調律、工部主事李若愚(萬曆己未[1619]進士)、浙江監察御史李炳(萬曆壬辰[1592]進士)、禮部主事周鑣、禮部尚書顧錫疇(萬曆己未進士)之奏議，表明史仲彬入祀鄉賢的過程；接著便是「崇祀嘉興府學宮鄉賢祠參語」。接續為「致身錄刻入諸書」，羅列二十五部採納《致身錄》所記史仲彬從亡事之書目，包括朱鷺(1553-1632)《建文書法擬》、錢士升《皇明表忠記》、黃承昊(萬曆丙辰年[1616]進士)《嘉興縣志》、周鑣《遜國臣記》、谷應泰(1620-1690)《明史紀事本末》、朱國楨(1557-1632)《史概》及小說《續英烈傳》等，之後是前述的「致身錄板行」。³²

這兩個版本都呈現周邊各類「副文本」篇幅多於僅一卷長之《致身錄》的現象，後者尤是。無論這些《致身錄》的史姓編纂者究竟確為史仲彬後人，抑或有史姓者牽連攀附的成份，這些副文本至少透過文字敘述與材料的編排，建構了一條史氏譜系，以連繫生於元末明初的史仲彬和晚明《致身錄》的出版。史冊「泰昌改元冬跋文」中所記載的便是《致身錄》的「發現小史」，而這部書的「發現小史」又始於家族史的追溯。史冊的記述如此：

冊髻時善記憶，王父蕪川公屬以輯譜，時授先世事行，知九世祖清遠公，當革朝，著奇節，所自述則裂疏書意中，後稍粘出，戒不以示人。語未竟而王父下世矣。詢之宗老，鮮有知者，譜成而不詳，冊之注念，未有已也。尋得墓表于吳文

³¹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5，〈再與徐虹亭書〉，頁33a。

³² 史在相編訂，《致身錄》，上海圖書館康熙八年(1669)刻本。另一康熙八年本，收於《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但數處缺文或印刷不明。內容與上圖刻本大致相同，但編排次序不同且較為雜亂，所收序文亦較多。

定集則喜，尋得行狀于西村公稿則喜，尋得詩若讚于諸錄中則喜，尋得數奏紀事于孫參知家則又喜。最後得所述于宗塾敗帙中，剝蝕至不堪讀，且悶且喜。二十年來搜剔無剩詞無餘力矣，而公之大節未有著也。³³

記述的開始，是一位幼子自其祖父口中得知其遠祖之奇節事。口傳訊息與文字記錄似乎俱在，但能口傳此事的祖父蕪川公「語未竟」即下世；遠祖清遠公的自述又為了避免觸禍，必須掩飾秘存，最後湮沒不知所藏何處；於是當年髫齡的敘述者史冊便扮演起「集佚者」的角色。這位集佚者自言其追索確有斬獲，陸續尋得清遠公史仲彬之墓表、行狀、詩讚及相關之敷奏紀事；然而關乎其生平最珍貴又隱晦的記錄，即其於靖難後從亡建文帝的自述，雖終尋獲，卻已「剝蝕至不堪讀」。史冊的集佚工作僅得其先祖行實之梗概，卻無力深入核心。這追溯祖事的困境，在史冊與焦竑的一次會晤中豁然而解。史冊記載道：

歲己未，攜兒宗節就正澹園焦師，進冊榻前，以《致身錄》示受而讀之，則向之疑而未敢據，缺而不及詳者，悉為豁然。遂請敘言，師口刺尾為詳得失始末，付梓未竟，焦師亦下世矣。³⁴

史冊之跋文為錢謙益批評為「蕪陋」的〈致身錄序〉（作者託名焦竑），補充了若干細節；或更精確地說，史冊的跋文將其個人的「發現小史」與焦竑序交織成為更完整的「《致身錄》發現記」。此序記述焦竑於萬曆戊辰年與二三友人遊茅山，遇連旬淫雨，一道士「以所藏雜供繙閱」，「最後得史翰林《致身錄》」；並解釋此書之所以流落茅山，乃因「成、宏間史之裔孫嘗攜以遊，道士窺而竊之者也。」³⁵此序中

33 史兆麟編訂，《致身錄》，崇禎二年(1629)刻本，不分頁。

34 史兆麟編訂，《致身錄》，崇禎二年(1629)刻本，不分頁。

35 此句見於道光年間曹溶輯，《學海類編》所收的《致身錄》，〈序〉，頁1a。引文中「宏」字應作「弘」，指弘治，「間」字應作「間」。

所述因由圍繞著一部可讀但因故離於作者後人之手的《致身錄》文本。相反地，史冊跋文中記載的是史仲彬後人苦心集佚至其墓表、行狀、詩讚、奏記皆備，獨缺核心《致身錄》文本的情況。這一序一跋的內容結合起來，恰好互補。史冊自言二十年來尋而不得的史仲彬關鍵記述，終於得到填補；而焦竑偶然獲得的孤立文本，也因史冊蒐集到的周邊資料而顯得身份明確，家世清楚。得於茅山「敝篋」的《致身錄》，並非流浪無主之書；其撰作、保存、遺失與重獲，背後聯繫著一個世系傳承的故事；其出版與流傳，是家族協力的結果。

除了明末清初學者論證此書為偽的種種理由，《致身錄》「發現小史」中的幾點巧合：如此書的發現者正是曾擔任本朝正史修撰、上書主張為建文立紀、並為張朝瑞(1536-1603)所編建文《忠節錄》撰序的焦竑，³⁶而焦竑〈《致身錄》序〉的撰寫時間恰在其過世前一年，又此序與史冊之跋似乎過度完美的互補，確實啟人疑竇。不過，即使此書確非實錄，或者，正因為此書非實錄卻廣受當時讀者作為建文朝史的補充而接受，我們可以再問：這部記述在當時究竟魅力何在？除了朝廷政策、社會風氣的推波助瀾，此書究竟如何刺激了當時讀者的歷史想像？他們在《致身錄》中讀到了什麼？

相對於戴彼得提到萬曆年間建文朝史的敘述暴力化，對刑戮之軀描寫的具象化，《致身錄》的記述不見戾氣而帶著幽婉調和的意味，正可謂是另一種對反的敘事風格，而其「調和」意味又可從萬曆年間針對建文朝史事的言說策略來理解。³⁷儘管戴氏認為自十六世紀中期

³⁶ 焦竑〈《忠節錄》序〉作於萬曆壬寅(1602)年。焦竑，《澹園集》，卷14，頁10a-12a。焦竑也另外為建文忠臣黃觀之妻翁氏作有〈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墓祠記〉(卷20)，及〈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卷35)。

³⁷ 早期試圖淡化成祖與建文忠臣對立的言論記載有：面對陳瑛上言追戮齊、黃之外另一批「叛逆」，成祖回應：「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齊、黃數輩

開始，對「靖難」的討論逐漸顯現不同的立場與觀點，值得注意的是：萬曆朝諸多論述建文朝事的奏疏、碑銘以及私家撰著建文朝史的序跋題記中，仍常見一個重要的論述理據，即表揚建文忠臣非但無損成祖英明，反而與成祖事功互補相成。以明成祖比周武王，建文忠臣比伯夷叔齊，是明人談論「靖難」時慣見的比喻，但這比喻在「靖難」論述中也有其逐步發展轉化的過程。最初，景泰至成化間重臣李賢(1408-1467，宣德年間進士)只是以哀辭律詩的形式，將建文忠臣周是脩(1354-1402)比於夷齊而不言周武。³⁸弘治年間，兵科給事中吳世忠(弘治庚戌[1490]進士)上書請賜建文忠臣爵諡廟祀，則直比「太宗之奉天靖難乃武王之心，孝孺諸人之伏節死義則夷齊之志。」³⁹稍後張芹(1466-1541)但言周武夷齊為例而不及成祖，仍是比較隱微的提法，其說：「不有武王，固無以安天下；不有夷齊，又何以風勵後世」，⁴⁰肯定武王安定大局之功，更強調夷齊成就的道德範式與死殉的建文忠臣精神之一貫。

將周武夷齊之喻進一步發揮者，可以焦竑於張朝瑞《忠節錄》序言中所論為代表：

余竊惟高皇帝翦除兇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為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籍

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明太宗實錄》，卷 14，洪武卅五年十一月庚辰朔條，頁 8a-b。後期群臣上書中亦常見引「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明神宗實錄》，卷 146，萬曆十二年二月戊申朔條，頁 6a。

38 李賢，《古穰集》，卷 20，〈周是脩先生哀辭〉，頁 20a-21a；卷 22，〈輓周是脩〉，頁 1a。

39 《明孝宗實錄》，卷 72，弘治六年二月丙申朔條，頁 9a。關於明中期朝廷文官間出現的重新詮釋「靖難」的嘗試及其發生背景，可參見何幸真，〈英廟「盛德」——明天順朝君臣對「建文問題」之態度〉，頁 1-28。

40 張芹，《備遺錄引》，頁 1a。

第令如盈、如建成、如德昭，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天之所興以長我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楊、騫，爭攀龍鳳之馭，絕迹羊豕之群，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羣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莫振，究且富貴熏心，廉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沉於淵，周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相成者哉！⁴¹

焦竑首先援引漢惠帝劉盈、唐高祖太子李建民及宋太祖之子趙德昭失位之例，肯定明成祖繼太祖而起，乃是歷史情勢的必然。一朝初立局勢未定，為國朝長遠大業奠基的工作，往往需要兩代帝王持續經營；而為「太宗」之繼起者必須上承「太祖」未竟之業，下啓後世久安之治，負任艱鉅，非泛泛之輩所能。以此觀之，朱棣作為「太宗」乃明代之福，所謂「天之所興以長我國」。然而在宏觀的理論下，從建文至永樂朝的政權轉移又帶出了道德問題。這裡焦竑只將道德問題的討論侷限於人臣之節，不及君主。先比成祖為「大聖人」奉之於無庸討論之高位，也是必要而安全之舉。人臣的道德問題，焦竑則選擇以「爭攀龍鳳」的變節之臣與捨身取義的忠節之士相對照。他假設：使成祖繼起之時，人人皆如蹇義(1363-1435)、楊士奇(1365-1444)、楊榮(1371-1440)和楊溥(1372-1446)歸附，則成祖所繼承者，豈非一人綱廢弛、廉恥道喪之國，帝業永固之基礎何在？儘管楊、蹇幾位在後來的歷史中皆證明其高才，晉升重臣，然而國無節士，則如「天柱折而將傾」，無所依憑。這時，焦竑的論說順勢引入殷湯與務光、周武與夷齊，轉化新興聖主與舊朝節士間的對立成為相互依傍的關係。「三子非湯武節不

⁴¹ 焦竑，《澹園集》，卷14，〈忠節錄序〉，頁11a-b。

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依此類比，建文忠臣正因成祖之興而顯其卓節，而成祖若無忠臣正氣逆勢撐持，亦不可能開創大明盛世。

焦竑之論，如同許多當時的「靖難」言說，自然有其政治考量。一個維護成祖的堂皇說法，當然是平反建文及其忠臣不可或缺的論事策略。但政治考量之外，焦竑文中的談論不無安慰作用，其中理想化的歷史詮釋，姑不論其實際效果，至少文字上是一種試圖彌合「靖難」歷史傷痕的說法。而這類撫慰性質的文字邏輯，在朝野大規模召喚建文英靈為之立傳祠祀的舉措中，影響或有深於政治託辭之處。朝廷表彰忠節，民間熱情傳播忠臣受難的血腥記述；朝野重新定義、合力重述建文朝史的努力，某種意義上也同時意味著重啓舊創。而在這「二次創傷處理」的過程中，建文遜國的說法乃至想像，便更見其吸引力。

熟悉明史者皆知，「靖難」金川門破後，宮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終。或言焚死，或言出亡，難有定論。傳聞的開放性，或者也是歷史敘述潛在的複雜性，鑲嵌在黃佐(1490-1566)《革除遺事節本》中〈建文君紀〉的敘述形式。《革除遺事節本》為紀傳體，開篇自〈建文君紀〉始。此文同一紀中分兩部份，分別自建文帝與成祖的觀點敘事，對「靖難」結局的表述也各自不同。第一部分自建文即位開始，至金川門破一幕，黃佐只有簡潔一句：「六月，文廟渡江駐金川門上，闔宮自焚，遂出走。」⁴²在此部份的最後，黃氏補上：

或曰：「建文帝之生也頂顱頗偏，高皇帝知其必不終，嘗匣以髡縹之具，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至是遂為僧以逃去。」

又曰：「……正統末自滇南歸京師，禁中以壽終。」⁴³

⁴² 黃佐，《革除遺事節本》，卷1，頁7b。據《四庫全書提要》，黃佐纂輯之「靖難」史事，分訂有兩個本子，一為《革除遺事》，有列傳無本紀，另一為此處所引《革除遺事節本》，以「君紀」為首卷。

⁴³ 黃佐，《革除遺事節本》，卷1，頁8b。

這是透過傳聞為帝「遂出走」之說補充細節，而細節又牽動了建文出走一事的可能意涵：加入「高皇帝知其必不終」的預言，則建文出走便是命定成數，而非叔父威逼；建文最終反歸京師，則出走之帝既未遭遇不測也未客死異鄉，以兵戎相接「闔宮自焚」收束的「靖難」事件，因為拉長時序補上了建文「禁中以壽終」的「再」收束，之前敘述的喪亂終結在更長的時間流中看來便成了暫時之厄。

成祖觀點的敘述，想當然爾不自建文始，而是以高祖封建諸子，其「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之讚語開端，再歷敘成祖南下攻至京城的「靖難」經歷。成祖與建文各自的「靖難」經歷在皇城中交會，敘述又再度來到金川門上那一幕，但細節又再不同。成祖觀點的版本是：

既臨大江，江師具舟迎濟，守城親王開門豫待。皇考慮驚乘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來朝之故。姦臣蒼黃知罪不宥，閉皇城門不內而脅建文君自焚。皇考聞之大驚，發眾馳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耶？」遂備天子禮斂葬。⁴⁴

這是建文帝的第三種可能結局。我們也可以輕易看出，這當是最符合成祖需要的版本：建文死終並合禮斂葬，如此斬斷關於少帝蹤跡下落的揣想與懸宕，增加了燕王即帝位的合法性。而此處所描述死亡的情境，又在燕王「發眾馳救，至已不及」的情況下；短短文字篇幅中這位率軍臨江者「慮驚乘輿」、「聞之大驚」、「仰天慟哭」，從謹慎、意外到悲痛情緒的快速轉換，營造出皇城內外隔閡的氛圍，更可見其極力緩解燕王出兵「靖難」之道德爭議性的企圖。

黃佐在嘉靖年間選擇以「羅生門」式敘述處理的建文終局，當中可見一種二分：建文死終的結局配合維護成祖的官方敘事；建文出亡

⁴⁴ 黃佐，《革除遺事節本》，卷1，頁10a。

的傳聞記述則透露對這失位少帝的同情。這樣的二分，很快就因加入了「建文遜國」的說法而得到調和。與黃佐同時，鄭曉(1499-1566)的記述便皆以「建文遜國」一詞為題。⁴⁵建文是否有意「遜國」，無從確知。然而正因為如此，建文無從得知的心思意圖成為後人試圖調和靖難敘事時，藉以調度發揮之處。「讓皇」建文是否有遜國之意，對於成祖的評價與形象有絕大影響。無遜國之說調和，則若非成祖有篡位之嫌，即是建文愚弱錯信近臣。⁴⁶遜國之說一出，則成祖與建文種種可能的過失疵議盡去，道德人格高度遽升，成為一禪讓美事中的兩大主角。此說讓成祖與建文在重構的歷史想像中，各取得一個正當而互不衝突的位置。陳學霖討論明成祖政權取得合法性的過程，便提出「共享帝國政權合法性」(co-sharing of imperial legitimacy)的概念以名之。⁴⁷

遜國之說顯然是可以有效彌合成祖靖難革朝的歷史中所隱含種種矛盾的潤滑劑。這種論述邏輯在崇禎二年及康熙八年兩版的《致身錄》諸序中，得到充分開展。崇禎二年版《致身錄》開篇的錢龍錫(1579-1645)序，便完全以「本朝家法昆弟叔姪之間忠厚相承」為旨立論。對於成祖派胡濙(1375-1463)尋訪建文下落十七年一說，錢龍錫如此詮釋：

文皇已正大統，必無仇建文帝之心，直以忠臣義士翼戴情深，不無防危制變之慮，而又不欲見利蠹生者賣帝以為奇貨。察忠安湖

45 鄭曉一系列以「遜國」為題的「靖難」史作包括：《遜國君紀抄》、《遜國臣事抄》、《建文遜國臣記》、《建文遜國紀》。

46 前引黃佐記述燕王聞建文死訊時哭嘆：「何不寤耶！」正類此。若再往前追溯，《明太宗實錄》的記載欲強化此建文形象之著力更為明顯：「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于火中，還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癡呆耶！」《明太宗實錄》，卷9下，太宗文皇帝四年六月乙丑條，頁3b。

47 對此概念之深入析論，參見 Hok-lan Chan, "Legitimizing Usurpation: Historical Revisions under the Ming Yongle Emperor (r.1402-1424)," pp. 121-129.

潞[篤慎周摯，託以肺腑。忠安久歷湖湘間，必深知建文蹤影，一以為防閒，一以為調護……文皇果欲致帝，不遣瑛而遣潞[，何歟？先是靖難師起，建文帝詔諭諸將無使朕有殺叔父之名，而金川不守，文皇從煨燼中哭指后屍葬以天子之禮，抑豈願有殺姪名者？蓋本朝家法昆弟叔姪之間忠厚相承遠邁前代者如此。⁴⁸

成祖遣胡濙追查建文下落於是不為追殺，反而是「調護」；胡濙的角色在此序的說法中成為建文的祕密保護者，而其「防閒調護」之職又是上承著成祖「託以肺腑」的深心。康熙八年本中的李日華(1565-1635)序，則將建文晚年歸返禁苑的結局視為決定「靖難」為悲劇或喜劇的關鍵。李文記其「幼讀遜國紀一字一哽，命曰鬱紆之書」，今確知建文故君得全，以此與殷湯、周武、唐太宗等千古事相比，「更命曰獨慶之典。」成祖繼統加上建文歸返，「何其雍容兩完也！」⁴⁹

建文遜國之說免除了成祖篡位之嫌，建文意在遜國，出亡流離道途，最後得全身而歸，則更是國朝之幸，兩全之事。也因此，包括史仲彬的所謂「從亡諸臣」形成了一種相對於建文「死難忠臣」的節臣典型。王廷宰的序文如此立論：

建文君遜去，天下曉然知天命之所屬。……在廷諸臣至折頸刳腹，碎肢糜骨，雖有萬乘之威，不改匹夫之節，人臣之誼。……而行遜諸公獨相率變姓名，擁故君出走，混跡緇黃，聲幽影秘，斯開闢以來創建之奇事也。……建文君既全揖讓之寔，文皇又無參彝骨肉之名，則諸公之所維持者大也。⁵⁰

48 崇禎二年《致身錄》刻本，亦見康熙八年《致身錄》刻本，及同年《致身錄》抄本，頁 9a-b。

49 康熙八年《致身錄》刻本，亦見於同年《致身錄》抄本，頁 3b。李日華此序亦收入氏著，《李太僕恬致堂集》，卷 13，頁 10-11。

50 《致身錄》抄本，頁 5b-6a。

長期以來，壯烈死難者一直是靖難野史記錄的重點人物。這些義烈之臣當面質疑成祖帝位的合法性，慘遭酷刑以身殉難並禍及親族，其事無論就道德內涵、殉難過程的戲劇性和悲壯性，都引發談論傳播，並激動聞者記述的欲望。建文忠臣的傳記，也的確是以這類「烈」傳為核心開展。而《致身錄》對建文流亡說法的鋪陳增飾，則提供了另一種忠義節臣的想像。王廷宰序形容建文君臣從亡「斯開闢以來創建之奇事」，點出了「從亡想像」與晚明尚奇文化的可能聯繫。更重要的是，相對於烈士們決絕的抗議姿態凸顯著國初政權轉移歷史的撕裂傷痕，從亡諸臣的存在，使「建文君既全揖讓之寔，文皇又無參彝骨肉之名」，帶來「成全」、「維護」的可能。倘若錢龍錫以成祖授意胡濙「調護」建文的說法顯得為奪權者飾非太過，則王廷宰序的詮釋由從亡忠臣擔任照護建文的角色，當是較能令人滿意的安排。

這類對於從亡諸臣的想像，也改變了建文忠臣與夷齊之間的譬喻關係。王廷宰對於從亡諸臣的讚賞，還立基在這樣的比較視野：「伯彝采薇不救太白之懸，豫讓漆身無補鑿臺之戮，諸公視此，不更卓異非常也？」⁵¹建文忠臣至此形成兩大類型：一為死難烈士，一為隱忍從亡諸公。前者堪比擬夷齊，後者則更勝之，因為夷齊的抗議姿態縱表達了其立場與道德高度，卻無濟於時事；反之從亡者隱忍隨扈，於是建文得免死全身，成祖得釋其罪愆，更見實質之功。陳繼儒的論點亦類此，甚至視從亡諸臣所成就更在於死難烈士之上：

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剛鬣屠滅之慘，視方黃鐵練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⁵²

51 《致身錄》抄本，頁 6a。原典出自《史記·周本紀》，卷 4，頁 124。

52 《致身錄》抄本，頁 8a-b。亦見崇禎二年刻本。陳繼儒此序亦收入氏著，《晚香堂集》，卷 3，頁 15a-17a。

建文帝相關的記憶，從傳言出亡，到遜國之說並添上從亡諸臣隨侍，乃至賦予從亡事愈益深重遠大的意涵；建文帝流亡的想像，隨著時間、官方律令、政治局勢、士人史家言說的需要，一層層擴充深化。萬曆二年，年幼的明神宗於御講時詢問輔臣建文帝出亡之事，暗示此一議題在內廷已得到相當程度的關注。⁵³之後修建表忠祠，赦免建文諸臣親屬後裔，這類朝廷舉措鼓舞了地方為建文忠臣立祠崇祀的風潮；地方上官員士紳以有益風教之名而推動的表彰工作，反過來亦促使文官向中央上書，為建文朝爭取更全面的平反與補償。⁵⁴而政治上，官員士人對於旌表建文忠臣一事之熱衷，與萬曆中期以後神宗消極的統治策略，又不無關連。面對神宗拒與帝國官僚體制合作的狀況，不滿的官員多以道德勸戒回應。黃仁宇分析，萬曆初期張居正就技術、制度面的改革失敗後，如東林黨人所提出的道德理想，或者說嚴格道德主義，可被視為一種彌補體制缺陷的作法。面對行之久遠，不易撼動的帝國官僚行政體系，士人強調儒家經典所提倡的倫理、堅毅、自我犧牲等精神價值，試圖藉此蓄積起強大的實踐力量，與僵化的體制相抗衡。⁵⁵在文官尋求透過標舉道德「振作」君上的努力中，建文忠臣作為一種人格楷模在晚明的政治環境中，有其實際的作用。

就士人史家言說的策略而言，我們也不難看出建文流亡加上諸臣從亡這樣的想法，對於調和政權衝突，修補歷史斷裂所起的作用。而這種作用，很可能在相當程度上反過來又使得流亡、從亡說成為在言

⁵³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建文帝出亡〉，頁11。

⁵⁴ 如萬曆廿二年(1594)開館纂修本朝正史，次年有禮科給事中楊天民(萬曆十七年進士)奏請為建文立「少帝本紀」。《明神宗實錄》，卷289，萬曆廿三年九月乙酉條，頁4b-6b。

⁵⁵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p. 534.

者、聽者、讀者心目中偏好的想像。在這裡，互恤取代對立，顛沛取代殺戮，回歸取代死亡。難以考證的歷史真相之外，這種論述想像所蘊涵的和解及撫慰的力量，幾乎可謂誘人。而《致身錄》鋪陳建文與諸臣流亡的細節，賦予此事一完整的敘述與人物血肉，又正都是對這「誘人」想像的具體化與完善化。如此說來，史仲彬究竟是否從亡，此作是否為後人偽託，便成為另一類問題。在更深層的意義上，《致身錄》反映當時政治言說甚或集體心理的需要，符合文學趣味，提供他類(alternative)道德範式，開闊想像過去的空間；在這種種面向上，此書都恰得可供其嵌入的位置。換言之，其流行背後實牽涉政治、道德、文化心理、歷史記憶、文學建構等因素的複雜運作，並非撰者作偽、讀者不察一語可以簡略帶過。以史實的標準檢證，此書恐怕確實虛構太多；然而作為感發動人的敘述，此書推出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成為故事主角之一，傳遞綿長堅韌的君臣情義，這虛構所得的迴響，弔詭地似又透露著時人意識或潛意識中的某些真實，並在提醒著歷史記憶的可塑性，及其與社會現實、個人情感之間的層疊交錯，相涉相生。

三、流離的暗示

從外緣社會環境轉向《致身錄》內部觀察，我們可以說，此書無論在取材、內容、結構乃至自我定位，都環繞在「追蹤集佚」的意象上。就取材而言，《致身錄》的人物建立在兩條傳說脈絡上。首先是建文帝流亡之說。⁵⁶較早的敘事見於王鏊(1450-1524)《王文恪公筆記》：

太宗師至城下，文闔宮自燔死。然或傳實自火逃出；或傳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然莫察其實。固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

⁵⁶ 關於建文帝流亡傳說詳細的考證，參見王崇武，《明靖難史事考證稿》。

張仙為名，實為文也。終是莫知所之。後至正統間，有御史出巡，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終不避。問之，乃獻詩云云。詢之，乃文也。御史奏之朝。詔廷臣詢，亦不察虛實，後卒于中云。其詩曰：「流落江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⁵⁷

約與王鏊同時的祝允明(1460-1526)，其《野記》中所記建文事，在某方面像是這段引文的詳盡化。相對於王鏊約略帶過出巡御史與僧人間的問答，祝允明記述了完整的對話。王鏊記錄僧人的真實身份，「詔廷臣詢，亦不察虛實」；祝允明則多記了內官吳誠因及往事而得確識建文的情節。⁵⁸關於正統初年有僧自稱建文之事，記載多方，明末清初學者已有考辨，此處不贅。⁵⁹王世貞對建文出奔諸說的評論值得注意：「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深，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⁶⁰這段話饒富意味處，在於王世貞的理性觀察與明代實際「追蹤」建文現象之間的矛盾。王氏所言合理無疑：建文究竟是否出亡難有定論；就算確實出亡，因形勢所需必當隱姓埋名，「滅跡以終」的

⁵⁷ 王鏊，《王文恪公筆記》，卷 61，頁 1362。建文帝未死於「靖難」之說最早當是見於《明太宗實錄》記谷王橐欲召號倡亂，詭言建文初實未死匿於其處。《明太宗實錄》，卷 178，永樂十四年秋七月辛亥條，頁 3b-4b。正統間有僧楊行祥冒稱建文之事，見於《明英宗實錄》，卷 73，正統五年十一月丁巳條，頁 8a。

⁵⁸ 祝允明，《野記》，卷 32，頁 522-523。這位終能確認建文身份的老宦官吳誠，在其他記錄中有時又名吳京。

⁵⁹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 21，頁 388-389。潘樞章，《國史考異》，卷 4，頁 35a-39a。

⁶⁰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 21，頁 389。

可能性遠大於自暴行蹤。但正因建文之亡，並無實跡足證；其若存，又必當隱跡而行；建文終局於是成為一種「隱匿之跡」的隱喻。若其確實死於宮中大火，則屍骨難辨，歸葬之處不明，死而無跡；⁶¹若未死，則建文隱匿存生的蹤跡，更引發時人後人追「蹤」之意。「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是信史記述理應收束的事件終點。⁶²

然而，無論在現實時空中建文是否的確歿於此刻，在敘述的時空，書寫的層面上，「帝不知所終」的論斷卻像是另一個起點，開啓了往後延伸敘述的種種可能。王世貞認為，建文出亡說之所以「有此紛紛」，皆因正統年間楊行祥冒稱建文一事所致。此事或許確實觸發了建文年邁歸返、終老宮中這類過度浪漫的想像。我們也另可以說：宮中火起一幕之後，建文的實體不復存在；無論生死，之後在敘事的時空中，建文帝卻以隱匿的蹤跡，片斷的傳聞開始，逐漸重生。這個重生的過程是漫長、漸進甚至枝蔓雜亂的。在此，不妨還是從王鏊與祝允明的兩條記錄談起。

除了增添細節，兩筆記錄起首對於建文流亡說的定位便不同。王鏊仍以當時官方說法「建文焚死」說開頭，續以建文逃出的傳言，再結論「然莫察其實」。如此之後所記正統朝建文「現身」之事，仍是以疑傳疑，聊備一說而已；王鏊也仍不忘歸結此說「亦不察虛實」。相對而言，祝允明的記載一開始即宣述：「建庶人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之後的敘述細節，目的在補充支持此一陳述。王鏊記中的疑點在於建文不知是否確實出亡；祝允明記中無法確定的訊息則關乎建文帝的下落。《野記》載建文：「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或曰武

61 「鞏都尉上疏請以建文君入祀典，崇禎帝曰：『建文無陵，從何處祭？』蓋建文之死，史謂葬倚天子之禮，所葬之地，南中杳然也。」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70，頁 12a。

62 《明史》，卷 4，〈本紀第四〉，頁 66。

當山。……或曰庶人削髮乘馬，自朝陽門出，至河南居某寺。……或又云在沐黔公府後，乃沐為奏還，非也。或又曰其出由地道」。⁶³這裡建文是否出亡已不是問題，問題已轉為「流亡何處」。祝允明綜錄各方傳聞的記述作用自不在提供確實的訊息，其同一條記錄中「或曰」之多顯示出的是：在其活躍的弘治、正德年間，關於建文流亡的細節，其所到之處、居住之地乃至逃逸出宮的方式，皆已出現各種說法。

大致歸納起來，雲南、⁶⁴貴州、⁶⁵四川、嶺南、⁶⁶浙江、⁶⁷湖湘、

⁶³ 祝允明，《野記》，卷 32，頁 522-523。

⁶⁴ 如上文祝允明《野記》所載。郁褒，《革朝遺忠錄》，〈附錄〉，「沐春」、「吳亮」條，頁 1a-b、13a-b。地域更聚焦的有謝肇淛《滇略》中對位於四川武定之「獅山」的記載。內言獅山「巖半有蒼曰龍隱，中祠建文皇帝云：帝自靖難師入，自髡以出，栖此山者四十餘年，始自白歸大內。今其像禪衣錫杖，淒然老衲狀也。」謝肇淛，《滇略》，卷 2，頁 27b。

⁶⁵ 徐弘祖，《徐霞客遊記》，〈黔遊日記一〉，頁 835-836。

⁶⁶ 王濟，《君子堂日詢手鏡》，下卷，頁 1825 記載：「橫人相傳，建文庶人遇革除時，削髮為佛徒，遁至嶺南，後行腳至橫之南門壽佛寺，遂居焉。」嘉靖《南寧府志》有兩筆關於「壽佛寺」的記錄，與王濟所載相呼應，其一概述建文於壽佛寺的活動：「建文君南遊為僧於此寺，居之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者千數，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手筆也。」另一條勾勒建文隱遁的路線為「自湖湘入蜀，自蜀入雲南復遊間，最後入廣西至此」，並指出建文所持用度牒署名「楊應能」。方瑜，《（嘉靖）南寧府志》，卷 5，頁 8a，卷 11，頁 20b；徐弘祖，《徐霞客遊記》，〈粵西遊日記二〉，頁 443-444。出亡的建文帝度牒署名「楊應能」，更早的記錄見於薛應旂，《憲章錄》，卷 24，頁 25a-b。之後「楊應能」在《致身》、《從亡》中成為落髮隨建文帝貼身從亡的三位隨臣之一（另兩位為葉希賢與程濟）。

⁶⁷ 聶心湯，《（萬曆）錢塘縣志》，〈紀勝〉，頁 29b 載：東明山上「有東明寺深隱庵，俗傳建文帝隱此」；〈紀制〉，頁 57a 載：「東明寺在安溪大遮山前，建文為僧至此有遺像。」同樣記錄亦見於萬曆中舉人吳之鯨，《武林梵志》，卷 4，頁 33a。牛若麟，《（崇禎）吳縣志》，卷 26，頁 59b 載：「皇駕蒼，在穹窿山。相傳國初有僧隱于此。建文帝曾過而憩焉，萬曆間始顯其名。崇禎間僧戒宣重建。」

河南都是傳說中建文駐足之地。⁶⁸從晚明謝肇淛(1567-1624)、徐弘祖(1587-1641)的記述看來，當時各地的「建文遺跡」似乎已多少帶有「觀光景點」的色彩。謝肇淛記雲南獅山上的龍隱祠，中有建文像「禪衣錫杖淒然老衲狀。」⁶⁹徐弘祖記粵西寶華寺，寺門上有建文題額「萬山第一」。⁷⁰訪黔地白雲寺，寺區內有跪勺泉，「乃神龍所供建文君者」；又有流米洞，米由崖間小穴出，「流以供帝，……洞左構閣，祀建文帝遺像，乃巡方史胡平運所建。」⁷¹地方上種種建文遺跡的浮現甚至彰顯，自然與朝中為建文平反之舉密切相關。從王鏊、祝允明到謝肇淛、徐弘祖的記述，可見建文蹤跡從明初的不知所終，明中葉的隱匿模糊，到明末成為輪廓明晰具體表記的對象，彷彿一個在歷史記憶中遊蕩漂流的魂魄，依附於某些特定的山寺叢林而逐漸生長形跡。

從片斷傳聞到《致身》、《從亡》書中的完整敘事，除了建文出亡的部份，我們不能不談這集佚工程的另一脈絡：對從亡諸臣的傳說想像。如上節所述，靖難史事的記述，最早是以遭成祖整肅的壯烈死難忠臣為中心而開展的。這些死難忠臣由於其守節不屈之言行震動朝廷京城，記錄傳聞相對清楚。與此類情形恰恰對反的，是遁跡遠方憑弔前朝，隱姓埋名者的記錄。這些記載在早期少見，筆者所見較早且詳細的敘事存於《姜氏祕史》。為了之後討論需要，筆者在此做較長的引述。這裡姜清(?-1534)引用一部《雪庵集引》記錄其作者：

松陽人，名暨姓不傳。永樂初，年逾壯者矣，始落髮為僧。遡江而上，抵重慶府□□□善慶里，山水奇絕，可遯。……既而，善慶杜氏景賢賢之，乃相與陟□親洞諸山，復降至□□松柏

68 祝允明，《野記》，卷32，頁522-523。

69 謝肇淛，《滇略》，卷2，頁27b。

70 徐弘祖，《徐霞客遊記》，〈粵西遊日記二〉，頁444。

71 徐弘祖，《徐霞客遊記》，〈黔遊日記一〉，頁635。

灘，旋視而曰：「盍於是乎寺焉以老？」景賢鳩材構之，寺成而入。昕夕命僧徒誦經咒，聞者傾聽則易之乾卦也。景賢曰：「上人祖釋而誦儒經，奚其可？」乃易伽梵，而寺以「觀音」名。……嘗買楚詞，泛小舟於灘之中流，讀一葉，輒投之水而哭焉，如是至于卷斯已。……閒居為酒，能破塵臆，每晡注一壺以候客，時至者雖牧豎不拒而與飲。漸曛，呼兒侍立曰：「我歌爾和。」……抑又有補鍋匠者，不知何許人，往來於隆安里間，帕首，身右短衲，業補鍋而食其力，垂老不漏一也。……人言其與雪庵故僚友。□□□□，不相聞訊，迹殊而心一也。謹以其詩附於是集之末，嗚呼，讀者以意，逆志則人之心白矣。豈終言曰：「知我者，其天乎！」⁷²

這位姓名不詳的雪庵和尚及其友人補鍋匠，將在明末清初成為建文隱遁節臣中的知名人物。⁷³《致身》、《從亡》二書也未忽略二人。值得注意的是，姜清的載錄方式，對於雪庵與「靖難」的關係，其實是暗示多於明言。這段記錄於原書中與一系列建文朝臣並列，因此其與建文的關係「想當然耳」。其形容雪庵其人的重點，從遷居四川，隱於觀音寺誦儒經，哭讀楚詞，好酒而歌，與僚友補鍋匠「不相聞訊，迹殊而心一」的關係，皆暗示著此人不可言明的悲愴與「靖難」之間可能的聯繫。記末呼籲讀者「以意逆志」以明白其人之心，亦是間接地強調雪庵悲懷之深刻及其難言之隱。姜清除了轉錄《雪庵集引》，

⁷² 姜清，《姜氏祕史》，卷2，頁319-320。關於《姜氏祕史》一書的介紹，及其之於建文史研究的價值，參見吳德義，〈《姜氏祕史》考辨及其史料價值〉，頁47-52。

⁷³ 王士禎，《漁洋精華錄集釋》，卷6，〈長壽縣弔雪菴和尚〉，頁921。詩云：「枳縣秋風愴客魂，金川遺事忍重論。誰從魚服悲宗國，唯有烏朝戀舊恩。葉下沅湘愁北渚，燕生鄴郢哭東門。至今松柏灘頭水，嗚咽寒潮弔屈原。」

未作其他補充敘述，可能亦正因訊息不明所知有限，故而難以斷言。

儘管如此，此記中所描繪出的雪庵形象，不可諱言有其動人之處；其所做所為與「靖難」的關聯又似呼之欲出，於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姜清之後，鄭曉(1499-1566)在其《建文遜國臣記》中對「雪庵和尚」的記述如此開頭：

雪庵和尚，明豎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為僧，西南走重慶。⁷⁴

除了將雪庵和尚隱遁重慶與「靖難」明確聯繫起來，鄭曉的記載主要部份與《姜氏祕史》出入不大，但幾個細小的出入卻有其重要性。首先，鄭曉記末加入了對雪庵和尚身份的揣測：「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為御史」，「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為監察御史。」⁷⁵其次，補鍋匠據《姜氏祕史》所記「往來於隆安里間」，嘉靖《浙江通志》也是如此記載。⁷⁶但在鄭曉記中，補鍋匠之號易為「川中補鍋匠」，「往來夔慶間」，其行跡由廣西轉向雪庵傳說中的四川。⁷⁷另外，雪庵落腳的山區，在《姜氏祕史》中為「□親洞諸山」，鄭曉記中載為「白龍山」；而在《致身》、《從亡》二書中，建文及從亡諸臣在四川活動的區域，即為重慶善慶里及其附近的白龍山區。更有趣的是，原本杜景賢為雪庵和尚築「觀音寺」之說，在此二書中與建文流亡的想像捏合為一。《致身》敘述建文在四川的行跡：「師[建文]近來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⁷⁸較《致身》直以建文帝代

⁷⁴ 鄭曉，《建文遜國臣記》，卷6，頁3b。

⁷⁵ 鄭曉，《建文遜國臣記》，卷6，頁4b。

⁷⁶ 胡宗憲修，《(嘉靖)浙江通志》，卷46，頁19a。

⁷⁷ 鄭曉，《建文遜國臣記》，卷6，頁5b。

⁷⁸ 《致身錄》，收入錢士升，《遜國逸書》，頁13a。以下所引《致身錄》

換雪庵，《從亡》的嫁接更細緻些，其記述建文與程濟「至重慶，遇雪和尚，問其居，云此中杜景賢，謂其葺一菴，在善慶里。師及諸弟子往焉，見其菴……地甚幽，師喜留之……題其菴曰觀音菴。」⁷⁹如此，野史中的片斷記錄匯入了完整的建文流亡故事。《從亡》的嫁接，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對之前野史記錄的偏喜劇性轉化；亦即：這裡的雪庵和尚不再是無能為力哭讀楚詞的無主孤臣，而成了隱匿民間，故君舊主的祕密照護者。瀰漫在《雪庵集引》中的悽愴感淡化，雪庵從敘述的主角退為配角。《從亡》的敘事仍有其感傷之處，但那已經是以建文流亡君主為中心的感傷，而非野地孤臣的感傷。

明中葉以來建文野史中這類隱遁節臣的傳聞記載，雪庵和尚的刻畫屬最動人，但不是唯一。事實上，許相卿(1479-1557)《革朝志》中建文忠臣傳記的編排，已開始就其盡節守忠的性質、方式分出「死難」、「死事」、「死志」、「死遁」、「死終」五類，稱為「五忠」；並定義「死遁」為「義不變，面易辭，而甘流離屏遠艱迹苦身之死而不貳者」。許相卿並在書敘中特別提到他曾聞諸老先生言：「文皇帝入都城之夕，郎御史給舍相與縋城逸去者四十餘人。詰朝覺察者以聞，後來遽谷窮山，人往往識之傭販禪宗中。」⁸⁰許相卿〈死遁列傳〉共錄 14 條，其中彭與明、周縉、石允常、程濟、高賢寧與王稔的姓名、籍貫、家世或官階、「靖難」時之事蹟作為相對清楚；其餘八條所記則與「雪庵和尚」的敘述性質近似，因訊息有限而記述片斷零星，若非傳主姓名身份不詳，便是事蹟細節無可考。例如：

梁良用，浙江定海人。建文中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壬午之變相率去為舟工，後皆死於水。

及《從亡隨筆》，皆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不贅。

⁷⁹ 《從亡隨筆》，頁 9a。

⁸⁰ 許相卿，《革朝志》，〈敘革朝五忠列傳〉，頁 4b、3a。

梁田玉，浙江定海人，洪武末仕至郎中，建文末與葉御史俱髡髮逃禪，晦跡終身。

梁良玉，建文中中書舍人，田玉族人也。靖難後逃入廣之南海，鬻書為業以死。

宋和，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為中書舍人，與郭節及海洲人何洲皆棄官變姓名為筮，死異域。⁸¹

這條筆記錄遠較「雪庵和尚」更為簡陋，但在起首傳主姓名和棄官客死異地的終局之間，卻似潛藏著多般可能性和失落的流亡滄桑細節；猶如空谷回音，徒留反響卻難見形實。

可能正因為這種種「不可考」，似曾存在又無跡而終的殘缺記錄，格外勾動後人對美好人格失傳不載的悵然。於是，鄭曉《建文遜國臣記》中的列傳編排，選擇了移除許相卿〈死遁列傳〉中事蹟較完備可考者，僅集姓名事蹟不詳者於同卷，在「雪庵和尚」記錄的周邊構成一「隱逸節臣」團體，包含梁田玉、梁良玉、何申、宋和、郭節、梁良用、梁中節、何洲、郭良、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馮翁、東湖樵夫共 14 人。這些人物多重複出現在《致身》、《從亡》二書中，成為建文帝的從亡諸臣。⁸²其中河西傭、川中補鍋匠，及馮翁一組明顯從上述雪庵和尚的記述中增生而來；梁田玉至郭良等九人，則又牽涉到

⁸¹ 許相卿，《革朝志》，卷 6，〈死遁列傳〉，頁 7a-b。

⁸² 《致身錄》的做法是，綜合傳聞記錄中有稱號而姓名不詳者，與僅存姓名而事蹟不詳者。其記述先總括交待從亡之臣「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淮，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郭節，時稱雪庵，時稱雪和尚。……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此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致身錄》，頁 9b。《從亡隨筆》則設計從亡諸臣先四散暗中隨扈，後一一於流亡途中改易身份，隱姓名而以號行。其人名與稱號的配合與《致身錄》不盡相同，如雪庵和尚易為吳成學，補鍋匠為黃直。見《從亡隨筆》，頁 4b、13a。

另一則「佚書發現」的記事。《建文遜國臣記》中對梁田玉的記載，在《革朝志》的基礎上，增述了這九位隱遁之人被發現的經過：

梁田玉，定海人。歷官至郎中。靖難兵入金陵，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為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嚙嚙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泐，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銓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忠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⁸³

敏感的讀者不難發現，此處所記的「發現」過程，與託名焦竑的〈致身錄序〉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都是一文士於寺觀中的意外所獲，都是敝篋敗帙中隱藏的珍貴記錄，也都因此錄之出而使之前亡佚不傳的建文忠臣得為人知；可說《忠賢奇秘錄》的發現情境，似為後來《致身錄》的「出世」提供了前例。⁸⁴還記得史冊自言苦心搜求先人史仲彬事跡，「最後得所述于宗塾敗帙中，剝蝕至不堪讀」，與此處王詔面臨其所得之書「事紙毀泐，字多斷爛不可讀」的情況近似。（見註33）不同的是，史冊的困境因為得到《致身錄》而解決。此錄非但內容不再如《忠賢奇秘錄》般簡陋零散，而且還是史仲彬「自敘」。「靖難」野史著者在記錄「雪庵和尚」、「某部郎中梁良用」一類「隱遁諸臣」時必須面對的遺憾與無力感，彷彿因《致身錄》之出而為之一釋。

行文至此，我們不難看出：在某種程度上，《致身錄》可說是建

⁸³ 鄭曉，《建文遜國臣記》，卷6，頁1a-b。

⁸⁴ 錢謙益已有見於此，參見氏著，《牧齋初學集》，卷22，〈致身錄考〉，頁757-758。潘耒章(1626-1663)亦有言：「遜國諸書，真贋雜出，蓋作俑者，王詔之《奇秘錄》，而效尤者，史仲彬之《致身錄》。」潘耒章，《國史考異》，卷4，頁40a-41b。

文君臣流亡種種傳聞記述長期層疊、融合並增衍的結果。最早一脈是建文帝未死出亡的傳聞，另一脈是自明中葉可見，如雪庵和尚這般的人物記述，逐漸匯聚生成一類「隱遁」建文節臣。這兩條脈絡在《致身錄》中，透過作者的去取接連，合而為一。那些令人唏噓，在「述史」的寫作規範中僅能獲得數行文字勾勒其蹤影的流亡者，在此書中成為一個個人物角色；那些行間不得不留白的細節，斷裂的敘述，在此書中得到補充接合；在此之上，全書的敘事聲音來自一位前所未聞的從亡之臣史仲彬。如此一來，不只建文君臣流亡的始末完整，其敘事者宣稱的特殊身份亦賦予此錄「見證」的權威。

四、聚合與再生

《致身錄》最為明末清初史家指責之處，正在於敘事者可疑的身份。《致身錄》錄首題「東吳史仲彬自敘」，採編年體，共 18 條，始於洪武卅一年(1398)，終於洪熙元年(1425)。其中第 1-11 條記建文四年中史仲彬與建文帝的互動；第 12 條記建文帝與諸臣逃亡的過程；第 13-18 條記建文逸去後，史仲彬幾次尋訪、拜謁建文之事。全文前三分之一的篇幅用於羅列史氏在朝的言行，與建文帝密切的互動，透露作者試圖透過建文的看重，樹立史仲彬敘事者聲音的可信度。⁸⁵然而作者的努力，成效恐怕有限，以史家所論此作的破綻，正以此部份居多。錢謙益、潘耒章藉由比較成化朝人吳寬(1435-1504)所作史仲彬墓表與《致

⁸⁵ 這些事例包括：洪武廿四年史仲彬「應詔執貪縱官吏廷見高皇帝」，受高祖稱許，建文即位不久即特照禮請之來京，「欽授翰林院侍書」；對於建文更定官制，仲彬具疏大略以安靜法祖為言；燕藩稱兵兩月，監察御史尹昌隆勸上讓位，仲彬廷斥尹為奸黨，上曰：「人臣之義，當以仲彬為正」；建文四年燕兵渡江，「仲彬請從方孝孺堅守之策」等等。《致身錄》，頁 1a-6b。

身錄》，指出後作中種種與史氏墓表所記不相合之處。⁸⁶例如《致身錄》與墓表所記史仲彬卒年有五年之差；《表》記史氏生平「足迹不出里閭」，《錄》則記其遍走海內訪主；《錄》中所記史仲彬交接之洪武、建文朝臣，證之其它史料，多有時間錯出矛盾之處；史仲彬後人亦吳寬好友史鑑(1434-1496)，於其《西村集》中為建文忠臣姚善、周是脩、王觀立傳，可見其並無避忌，若其祖仲彬確有從亡之事，「何獨於己之祖則諱而沒其實乎？」錢、潘之言相當有力地論證，儘管史上雖有仲彬其人，但無從亡實事。史仲彬實不在從亡之列，卻以「圈中人」的身份權威擔任《致身錄》的記述者，令讀者多信以為真，無怪史家們萬不能接受，而必條陳其據力證其偽。在實證層次上言《致身錄》為偽，當無疑義。

然而，真偽的關係往往遠較簡單的對立二分複雜。尤其是對《致身錄》這樣一部實事傳聞層層增疊，述錄者集佚填充的心理時時作用的文本，非偽即真的判準，恐怕過度簡化。孟森已指出：「謙益謂《致身錄》為偽書，仍以建文之出亡為實事。」⁸⁷錢、潘所證乃史仲彬不在從亡諸臣之列，但並未否定建文出亡之事。而在求實考證的另一端，建文及其隱遁之臣的傳聞記錄仍不斷誘發想像。容我們再度回到王鏊對建文出亡的記載。筆者已指出，王鏊所記傳聞文字簡要，概因其不知為不知，書法堪稱謹慎。然而其記最後錄(據傳為)建文詩作一首，其目的或許只為備存，但詩歌本身的作用，有意無意間還是逸出了王鏊敘事文字謹慎控制的意圖，渲染了流亡孤主的哀感。其詩曰：

流落江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

⁸⁶ 潘樵章，《松陵文獻》，卷10，〈史鑑〉，頁5a-7a。

⁸⁷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正續編》，〈萬季野《明史稿》辨誣〉，頁16。

綠，野老吞聲哭未休。⁸⁸

此詩託名建文的可能，或許大於建文自作。好壞姑且不論，其指涉並轉用兩首杜甫(712-770)名詩，首先便透過召喚共同歷史記憶鋪墊出某種程度的情感底蘊。首聯點出一盈頭白髮的流浪者，緊接頷聯「乾坤」與「江漢」相對，讀者很容易便聯想到杜甫晚年流寓西南時所作〈江漢〉一詩：「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⁸⁹此詩中人，亦是一老病流落他鄉的「思歸客」。不同的是：詩中此人「心猶壯」、「病欲蘇」，並仍以「識途老馬」自比，傳達的是窘困孤立仍力圖振奮的自勉之意。在「建文詩」中，「江漢」與「乾坤」則不只標誌空間，還牽繫詩中人主觀的情感，故而「乾坤有恨」、「江漢無情」。復次，尾聯「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則緊扣杜甫另一詩作〈哀江頭〉開頭：「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⁹⁰〈哀江頭〉寫於安史之亂期間，杜甫在「胡騎塵滿城」的狀況下行經曲江，感傷於楊貴妃遭遇的起落，戰亂前後的今昔之別。詩以「少陵野老吞聲哭」起句，末段「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對比個人經歷世事興廢而生之哀

88 王鏊，《王文恪公筆記》，卷 61，頁 1362。此詩不同版本文字略有出入，如《列朝詩集》首兩句作「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錢謙益，《列朝詩集》，乾集之上，頁 9。

89 杜甫著，仇兆鰲註，《杜少陵集詳註》，卷 23，頁 60-61。

90 杜甫著，仇兆鰲註，《杜少陵集詳註》，卷 4，頁 39。〈哀江頭〉全詩：「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情，與草木無動於人事戰禍的自然遞嬗，全詩感傷之意已深。「建文詩」中以類似的無情自然／有情亂世對比收束全詩，但強調「新蒲細柳年年綠」已四十載，野老吞聲哭泣之慟卻仍未已。若說〈哀江頭〉終句「欲往城南望城北」寫出詩人眷戀北都但必須南行的無奈；則此詩終句似乎更陷溺於不可自拔的感傷。

「野老吞聲哭未休」具象地呈現了一位流亡君主的綿綿憾恨與飄零無依。喪家失國的悲痛在年年自顧新綠的蒲柳反襯之下，更顯得因不受顧念而格外蒼涼。詩中故主被遺忘於天地間的孤離，可說有效地深化了明代「有情」讀者對建文的同情。詩末野老無法自抑的飲泣似餘音盤旋，要求被傾聽與記憶。王鏊記述建文終局的文字節制，可見其不妄斷不臆測的用心。但其記末所錄之詩，由於遣詞用字加上意象、典故作用，使安史之亂中的唐皇、楊妃、杜甫，與靖難影響下建文帝的遭遇彼此交疊又相互投射。唐皇貴為帝王卻無力回天，楊妃在烽火煙塵中從金枝玉葉淪為血污遊魂，又，倘若確實有一個僥倖逃脫流亡數十載已成老叟凡夫在建文，回視過往對比今昔，其關照的位置與杜甫亦有若干類似。建文的淒涼滄桑，無論是想像或真實，就在歷史記憶與互文作用下，變得格外可感且飽實。王鏊的敘事文字試圖忠於事實，但附錄之詩因其詩歌語言的特性，卻別有一種能夠興發感染的力量。敘事文字表達建文流亡說虛實難察存疑為當，但詩歌的表述強化的卻是失國流離難以排遣的憾恨，連帶豐富了想像建文流亡的種種可能，也因而逸離了敘事文字原有的意圖。

循此思路，我們又可發現姜清對「雪庵和尚」的記錄也有類似的情形。前文已論姜清此條記載轉錄自《雪庵集引》，對其他訊息不明處少作引申。但有趣的是，面對所知有限記錄未能完整的問題，作者在記末提出的解決辦法卻是：「嗚呼，讀者以意逆志，則人之心白矣。」

豈終言曰：『知我者，其天乎！』」呼籲讀者探求雪庵之志。⁹¹無論探求理解的方法，亦即用以「逆志」之「意」，指的是透過文章意旨、讀者之意或詩人之意逆測詩人之志，姜清相信，或者至少期待詩人的深心，儘管缺乏完整確鑿的訊息，仍有被剖明揭示的可能。⁹²換言之，只要用心推敲感受，實錄的欠缺並不足以阻礙讀者貼近詩人之志。

明末清初《致身錄》真偽的論辯中，一種維護的說法是此書「信固當傳，疑亦可恤。過而存之，不忍廢也。」⁹³考慮「建文帝詩」中的情意和姜清面對斷簡殘編提出對建文逸臣「以意逆志」式的理解，我們便不難看出仕宦們認為此書「可恤」之處為何，「不忍廢」的原因又何在。《致身》關係史仲彬處儘管有種種疑點，即使此人從亡之事確實子虛烏有，但書中所敘的君臣情義，可說已得斯人之「心」、「志」。無論從亡細節，從亡節臣的確切身份（這些畢竟都已無可確考），以建文之仁，待臣下之和洽，倘若建文真得出亡，則故主舊臣間的互動的情狀可以「想見」應當如此。《致身》敘述幾次史仲彬與建文的會晤，重點不外凸顯臣下對於君上的照護，以及君上對臣下的愛恤。永樂二年，建文（時已祝髮為僧應文）與貼身從亡三臣（比丘楊應能、葉希賢及道人程濟）同投史仲彬家，但僅停留一夜即去。史氏請問速去原由，建文泣曰：「東南逋臣，屈指先汝，我去正為汝計。」兩人相對而慟久之，彬「視師衣履敝甚，固留三日，命家人製師服。」⁹⁴

失位流亡之君同時也失去了生活上的依憑，加上復需隱姓埋名躲

⁹¹ 姜清，《姜氏祕史》，卷2，頁320。。

⁹² 《孟子·萬章》中「以意逆志」一段經文有很大的詮釋空間。關於此問題詳盡的探討，參見林維杰，〈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朱熹對《孟子·萬章》篇兩項原則的詮釋學解釋〉，頁109-130。

⁹³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14，〈建文年譜序〉，頁685。

⁹⁴ 《致身錄》，頁12a。

避追捕，生存處境之艱難恐有甚於一般百姓。而君臣之情義，也就表現在基本生存全身遠禍、衣食供給的需求。永樂五年史仲彬與其他故臣相約，赴白龍山再次謁訪建文，見故君：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蓋夏日患痢，因有戒嚴不能時時出山，供膳狼狽至此，對而慟，隨問曰：「汝等帶得方物與我嘗否？」各為獻，彬獨有僮而所獻豐況。當年職居禁近，知師所嗜若金華火肉、淡菜、金山魚……六味。見之大喜。……(諸臣)行之日，師痛哭失聲，囑曰：「今後再勿來，道途阻修一難，關津盤詰二難，況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行。⁹⁵

昔日天子之尊淪落不得溫飽，以至乍見舊臣慟哭之餘，隨後便緊接問及食膳，近乎滑稽，復亦可憫。失位的建文成為無力的弱者，時時遭受飢饉、病痛、瘡瘍、風霜以及官府追捕的威脅。其之得以存續，就《致身錄》所載，多虧從亡隨侍如程濟，及道路供給衣食之臣如史仲彬等不離不棄。對於從亡節臣的照顧，建文也還以體恤與愛護之情。

《致身錄》對建文的描繪算不上深刻，但倘若我們考慮晚明的君臣關係，則錄中所述可以被理解為政治實況的逆寫，透露出士人的「自我角色意識」(借用趙園之語)及其對理想君臣關係的建構。趙園析論明清之際士人對君臣關係的思考時多方徵引，如明中期有陸粲(1494-1551)言漢唐以下未有君臣「隔越不通如近世之甚者」；⁹⁶之後熊開元(1599-1676)言崇禎對臣下「一面用之，即一面疑之，疑之既久，猶復用之，厚其貶而後加以顯戮，為操縱在朝廷，無幸脫也。」⁹⁷趙園結論：「『果於誅殺』正得諸遺傳——太祖、成祖、世宗等無不『果於誅殺』。除

⁹⁵ 《致身錄》，頁 13b-14a。

⁹⁶ 陸粲，〈法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收入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卷 289，頁 5b。

⁹⁷ 熊開元，《魚山剩稿》，卷 2，〈上方禹修閣老〉，頁 41a-b。

卻史家所樂道的仁宣之世，有明一代施之於士大夫的暴虐，由太祖到崇禎，確也像是完成了一種政治性格。」⁹⁸若明代「酷刻臣下好刑殺」的政治性格為遺傳，則建文代表了皇室血脈中「不」帶此「酷刻」基因的一支。⁹⁹只是，這股仁惠血脈並未能在物競天擇的現實中勝出。對不少明代士人而言，這或許可堪唏噓感慨；然而卻也正是建文歷史上失敗的下場，游移的位置，使他成為士人寄託種種心緒的對象。《致身》中，正因君主落難，大大拉近了君臣之間上尊下卑「隔越不通」的距離。君上仰賴並體恤臣下，臣下為仁主盡忠致身，恰為士人內心企慕亦知現實中不可得的理想君臣關係。

倘若《致身》僅是觸動其時士人之心意，在敘事內容的實際操作上仍顯疏簡，那麼《從亡》則表現出進一步細緻化這理想君臣故事的意圖。後者的細緻化工程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談。首先是敘事者的改變。相對於《致身》可能隱含了史氏後人藉揄揚先人事蹟以求抬高家族聲譽的意向，因而必須特別提出名不見於之前任何「靖難」記事的史仲彬為此「秘錄」的敘述者，《從亡》選擇了在「靖難」野史中相對較早出現的程濟作為敘事主角。這些材料一致地記錄程濟曾為四川岳池縣學教諭，有法術。建文朝初曾上書預言北方將有兵起。朝廷以其言論不當，本欲殺之，後從程濟自議，待至預言之日過後若無兵起再殺。繼而戰事確實爆發，程濟於是得到赦免，並受任為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軍先鋒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¹⁰⁰既然史書確載程濟「靖難」後不知所終，則以

98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頁281。

99 「靖難」之初建文有「毋殺叔父」之令的說法，在後來歷史和文學記述中可說幾乎定型成為建文仁柔性格的表徵。

100 黃佐，《革除遺事》，收入《國朝典故》，卷22，頁384；姜清，《姜氏秘史》，卷2，頁333。程濟的預知能力還不只此，《姜氏秘史》以來諸

追隨建文從亡解釋其不明下落，既與史籍所載無明顯抵觸，又賦予《從亡》更為貼近建文的記述視角。《致身》受限於史仲彬乃「給運衣食者」，建文流亡近四十年只得與故君六次會晤，其錄所記不能出乎此。相對而言，程濟在從亡諸臣中的分工屬「左右不離者」，四十年來幾無須與不隨侍建文身側，因而《從亡》自出亡每年一記，共 39 條。如此，則傳說中建文四十年的流亡，不再是零星跳躍的載錄，而成為一連貫的敘事；程濟的預卜之術也行使作用，指導著建文流亡期間的行止、動態及移動路線，作為這長期流亡敘事的主要驅動機制。

其次，由於程濟與建文「朝夕同伴」，敘事者的不同位置也就允許《從亡》較細膩地想像建文所遭遇的種種身心困厄及情感樣態。在《致身》的基礎上，《從亡》尤值得一提的轉化在於寫出了仁君節臣四處漂蕩，忍困受厄，最後逐一凋零的淒涼。隨著時序前進，先是和程濟同為貼身從臣的楊應能、葉希賢兩位於同年先後病死。「師哀毀忘食……以能、賢既卒，朝夕憂思，竟成胃腕之疾。」三年後，「師設奠祭楊葉二和尚。師先一日夢能、賢，因慟覺，固有此舉。」¹⁰¹同年，一日建文投宿某寺，見廊下兩病者，即「往來通音信給衣食者」中之黃直與馮淮：

師命濟語僧，移於舍東。師泣曰：「二子為我來也。」因覓醫治之。此地偏寂無人煙，不得醫。數日，淮、直竟死之。慟久。……十一月，立諸從亡死者之主於舍東。¹⁰²

記也都提到：徐州捷時，諸將曾樹碑上錄統軍者姓名。「靖難」後永樂帝過徐州見此碑，大怒，命左右擊毀之。摧擊之際，永樂轉念命人錄碑，「乃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這當中唯一的倖存者即為程濟，原因是碑立之初程濟一夜曾往祭碑禱禳，其名恰在石碑遭擊損處，故得存。不過，《明史·程濟傳》，卷 143，頁 4063 卻言：「然考其實，徐州未嘗有捷也。」

¹⁰¹ 《從亡隨筆》，頁 13a、14a-14b。

¹⁰² 《從亡隨筆》，頁 14b。

為躲避追捕，建文及其從臣移居遷徙頻繁。倘若建文不曾巧遇直、淮於道途，則這兩位追隨故主浪跡的節臣多半將客死異鄉無人曉識。而即使如《從亡》所記君臣得遇，野地無醫，直、淮二人仍免不了客死異鄉。唯一不同的是：建文的在場使兩人免於成為無名死者。目睹效忠於己之臣鞠躬盡瘁無醫病歿，建文承受節臣丹心一片卻無能為力的哀慟（縱然只是《從亡》虛構的「可能」情境），可以想見。失位的建文以其無異於凡人的處境和能力，只能對其忠臣報以銘刻入心的記憶。夢見亡於先的楊葉二和尚，「因慟覺」，是牽動心魂以夢憶；立從亡死者之主定期奠祭，是照護亡靈儀式性的記憶。直、淮逝後兩年，雪庵和尚涅槃；之後包括史仲彬諸臣一一棄世。而漸漸，文中「從亡諸臣立主」的敘事持續重現。從流亡早期建文「齋祭死難諸人」，到後來從亡諸臣之主列名愈眾，建文每易居所，便於舍旁立主，《致身》藉建文與史仲彬之往來所點出的君臣情義，到了《從亡》中轉化為「生人亡靈為伴」的覆疊意象；縱然衰老死亡的陰影逐步侵噬，君臣死生不相離棄。出亡第二十年，書中並記：「辛丑春二月，陰雨連旬，師命濟誅茅護楊葉之塚。」¹⁰³除了奠祭，建文時刻顧念呵護死者之意顯見。

亡臣如此，始終隨侍在側的程濟與建文關係又進一層。《從亡隨筆》敘程濟兩度重病，第一次在從亡第一年，建文坐病臣之側須臾不稍離，並「親為煮糜。」¹⁰⁴第二次在從亡第二十八年，聞史仲彬死訊後一年，「冬十月，濟病，師惶懼日呼曰：『能、賢佑濟！能、賢佑濟！』」¹⁰⁵此時從亡諸子所存者僅餘建文程濟二人。書中簡潔敘事，一旦「濟病」，建文緊接反應以再三呼號求助於已逝之臣的亡靈；記述文字的直截，有效傳遞出這位數十年流亡君主孤獨、絕望、恐懼失

¹⁰³ 《從亡隨筆》，頁 17b。

¹⁰⁴ 《從亡隨筆》，頁 7b。

¹⁰⁵ 《從亡隨筆》，頁 21b。

去的心理狀態；也創造了一對患難君臣相濡以沫的動人形象。

程濟存活下來了。《從亡》以建文歸返京城終了，結尾如此敘述：

冬十月，濟還滇。時濟聞師入大內，心自語曰：「今日方終臣職矣。今皇上寬仁，親親之誼，應能原此。」乃入滇焚其庵，散其徒，平二塚，紀其始末，以付了空，名曰《從亡隨筆》云。¹⁰⁶

一位節臣完成了照護舊主的任務；流亡自少而老的建文帝歸返大內以終；「靖難」的創傷交予「親親之誼」彌補；流亡期間的苦難遭遇，眾人款款情深生死相護，則成就了一段君臣佳話。這個故事裡不乏病痛、困頓與死亡，但考慮現實中「靖難」引發的性命死傷，永樂的鎮壓，傳聞的隱諱，文書記錄的散佚，以及從事發到《從亡》成書近兩百年的時間距離，此部敘述的完整和結局的圓滿同時也像在訴說著一種難以置信的美好。面對這「過度」完滿，我們無疑可以實證的方法揭示其不合事實之處，這也是到目前為止學者們討論、認識此作的主要方式。而筆者在此提出的另一種可能，則是將其視為建文流亡故事長期集佚工程的集大成。《致身》剪裁連綴與建文帝和隱遁之臣相關的紀錄傳聞成一完整敘事，而《致身錄》本身問世的過程，復又被塑造為一本「佚書」的發現。這部「集佚」的「佚書」中，建文和諸逸臣在先前著錄中隱匿山林野地，忽隱忽現似有若無的蹤影，逐漸透過連貫的敘述落實行跡。透過轉換敘事者的身分與視角，《從亡隨筆》的從亡情節則更為流暢，也更著力於刻畫君臣情義。

再進一層說，這項集佚工程的發展方向其實是脫軌的。它始於盡力蒐羅集佚以存實，或者至少存跡的心意，例如王鏊、姜清之錄；然而這些記錄所引發的卻是後來聽者、讀者想要繼續追索深求的欲望。事件的關連、人物的內心、更多節臣義事隱而未彰的可能，都引人懸

106 《從亡隨筆》，頁 26b。

念。但同樣令人挫折的是這些懸念，依現實情況，恐怕也只能永遠懸蕩無所附著，如同片斷敘事歷歷卻無法完成的故事，旋律各自動人卻無法成章的樂曲。面對這些潛藏遁逸的人物記錄，《致身》與《從亡》所採取的做法是極端的，它們匯整眾說、填補空白，透過完備敘事安頓飄零人物，但同時也踰越了虛實分際。就求真存信的史法標準評判，兩書混雜虛實，妄加引申，自然不足取。錢謙益言《致身錄》乃「妄一男子，欲薦擢其先祖，信筆排纘」，有其論據。¹⁰⁷有見於《致身錄》之影響流布，《從亡隨筆》加工更細繼之而出，亦有可能。家族聲譽、文化資本、市場流行、藉出版牟利都可能是二書出版背後的考量。本文目的也並不在為《致身》、《從亡》之不符史實開脫。然而若拉長時間向度，將此二書置於自明中葉以迄明末，「靖難流亡」主題在不同文字記錄中流衍變化的脈絡之下，則其意涵及重要性又自不同。兩書在晚明士人間引發的回響，顯示其所建構的建文流亡敘事，打動了當時多數的讀者。混雜虛實於史法不容，但是倘若書中敘事並非「妄」加引申，而是「切中」建文及其從亡諸臣情意的引申，則記述中的「虛構」反而可視為成功的詮釋。這當中於是便有了「求實」與「述意」的分野。

集佚工程的脫軌又與後人對歷史記憶的選擇息息相關。顯而易見，這集佚工程同時也是記憶工程。「集佚」一開始是為了免於遺忘，「脫軌」則是因為洞悉了記憶的規則。平反、祠祀、銘記建文忠臣皆是公眾記憶的形式。此一延續自萬曆的熱潮，反面也透露了不在正典祀奉之列，亦無私人著錄的記憶邊緣化消逝的危險。當建文忠臣的祠祀熱烈進行之時，建文帝本身由於無確跡無陵寢，加上其祠祀的正典化將直接衝擊永樂正統性的政治敏感，這位原該是「靖難」平反活動

107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22，〈書致身錄考後〉，頁759。

的要角，要到明亡後才在南明時期得到追諡。¹⁰⁸從臣的追奉易於並先於其主，這是歷史處境的反諷，也道出了記憶體制免不了的政治性。從這個角度看，《致身》、《從亡》二書完備化建文流亡的敘事，未嘗不是在追念「靖難」的角力中，為建文取得了一席之地。它們的確悖離史實，但這悖離或也可以視為對佚失史料侷限的掙脫。它們的附會穿鑿，弔詭地為之前斷簡殘編中飄忽閃現幽靈般的建文形像，賦予血肉，使之重生。¹⁰⁹晚明乃至於今時，建文帝形象很大程度上，仍舊本著這些流亡敘事所述被記憶著。

五、餘音

建文流亡敘事轉化的關鍵時期之一在明末，但其影響並不止於此際。關於之後建文流亡敘事進一步的演變，篇幅所限必須另文再述。考慮明末清初在文學文化意義上的接連性，此處值得略做補充的是：經歷明清易代，建文境遇在清初傳奇《千忠錄》中的變化。寫作於康熙年間的《千忠錄》，情節從建文四年南京城將破之際開始，以建文歸宮生、旦團圓作終，中間搬演建文在隱遁諸臣的護衛下流亡數十年的歷程。諸臣中，貼身從亡的程濟由「生」角扮演，與由「小生」飾演的建文帝為全劇核心人物。其次則是「外」角史仲彬。這樣的情節

¹⁰⁸ 崇禎十七年七月追諡建文為「嗣天章通誠懿淵慕謹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追贈廟號為惠宗。參見李清，《三垣筆記》，頁104。牛建強，〈試論明代建文帝歷史冤案的反正過程——以明中期建文朝史籍纂修為視角〉，頁32-38。謝貴安，〈試論《明實錄》對建文帝的態度及其變化〉，頁30-37。

¹⁰⁹ 據謝貴安所言，「到萬曆年間，儒臣們對建文歷史的記憶已經十分模糊，連他繼位多長時間都不清楚了。」官員奏疏中不乏誤以建文在位有五年者。參見謝貴安，〈試論《明實錄》對建文帝的態度及其變化〉，頁31-32。

與人物設計，明顯與《致身》、《從亡》書中所建構的建文流亡敘事密切相關，也說明兩書影響所及。

不同的是，除了失國飄零的哀感，《千忠錄》作者另為建文的角色增添了戰亂見證者的面向。相對於《致身》、《從亡》二書中想像建文在逃亡同時，仍有些許遊歷的空間，¹¹⁰《千忠錄》進行的基本節奏，則是由一幕幕死亡場景串聯。建文在第六齣「燒宮」目睹皇后投火自盡；透過皇后自盡前所見宮中景象和內心感受——「驚眸，似炎天赤水流；奔虬，看薰天烈焰浮」，¹¹¹劇作傳達一種當下感，有別於《致身錄》「大內火起」，《從亡隨筆》「上命舉火焚宮」一句帶過的簡略淡然。第十一齣「慘觀」中，建文在流亡道上面對永樂即位後整肅建文舊臣親族的慘酷。受難者首級裝載數十車運於道途，親眷婦女成俘囚受鞭棍驅行，引建文淚唱：「裂肝腸！痛誅夷盈朝喪亡，郊外血湯湯。好頭顱，如山車載奔忙。……添悲怏！泣忠魂飄颻。羞殺我，猶存一息泣斜陽。」¹¹²這死亡流離之慘狀與明清易代之際戰亂景象的交疊回應，自是不言而喻。¹¹³從集體性的死亡場面到第十三齣「雙忠」，劇作家聚焦在建文目睹吳成學、牛景先兩位從亡忠臣頂替自身和程濟接受官兵追緝，破面毀容自刎而亡。第八齣「草詔」描寫方孝孺直斥永樂篡位，受刑不屈從容就義的著名橋段；與之遙相呼應的是第二十二齣「索命」，設想年邁的永樂在榆木川死前一夢，夢中先是

¹¹⁰ 《從亡隨筆》，頁 8b、18b。

¹¹¹ 徐子超，〈《千忠錄》〉，頁 17。《千忠錄》作者不確，目前學者們主要提出三位可能人選：李玉、徐子超、王吉武。相關討論可參考劉致中，〈《千忠錄》作者考〉，頁 94-101；鄭志良，〈《千忠錄》作者考辨——兼與劉致中先生商榷〉，頁 96-101。

¹¹² 《千忠錄》，頁 40。

¹¹³ 關於這點，詳盡深刻的分析參見王瓊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頁 41-53。

太祖朱元璋現身斥責永樂「靖難」之非，繼而方孝孺魂魄引出眾多受害冤鬼向永樂索命，永樂在驚嚇之中氣絕。

這些流血暴力的場面在《致身》、《從亡》之作中絕無。取代二書中繚繚哀感的，是對慘酷血腥景象的逼視。《千忠錄》中烘托永樂與方孝孺的對立，召喚死難亡靈對永樂進行集體控訴，這樣的處理距離萬曆年間試圖弭平永樂和建文矛盾的言說，已大為不同。「燒宮」、「慘觀」、「雙忠」三幕，建文不僅流亡，並在劇作家的安排下，成為受難者最沉痛的見證。目睹皇后宮舍喪於火海，舊部忠臣死於非命，親族流離失所，對於自己的「偷生殘喘」，建文再三唱嘆「羞殺我」，「赧顏悲悼」。¹¹⁴劇作家批判了永樂，對於建文的同情，也未必就全無保留。

如果說《致身》、《從亡》書中的君臣關係，因為君主失位於從臣多所仰賴，在諸多方面近似友輩；那麼《千忠錄》中描述君臣關係的文字，則更逾此引發情愛聯想。十七齣「虎救」，描寫史仲彬扮作乞丐潛赴雲南尋君，一路餐風露宿，歷盡艱辛，在慶鶴山懸崖峭壁間勉力攀越仍無所獲，絕望之餘唱訴其心思：「拚得個跳深崖身喪他鄉，也博得飛魂魄日侍君際。」¹¹⁵之後遇盜又因飢饉昏厥於山中的史仲彬，巧為外出托鉢覓食的程濟所救，進而得會建文。這對十多年不見的君臣相遇，劇作家如此處理：

(小生抱外跪哭介)(小生)

[瓦漁燈] 想殺你初分袂泣離，想殺你受災危，想殺你數載音容背，想殺你南和北遠隔天涯，想殺你蝴蝶夢中同悲涕，想殺你望長空欲飛，想殺你驚聞楚變空心摧。

¹¹⁴ 《千忠錄》，頁 53。

¹¹⁵ 《千忠錄》，頁 64。

建文哭唱一連串「想殺你」，內中數般情緒層疊，包括分離的感傷，設想對方艱危處境的心焦，以及渴望聚合不得的無奈。這唱詞所傳達的懸念甚至可見兩重投射，「想殺你驚聞楚變空心摧」一句，建文設想史仲彬聽聞吳成學、牛景先捨身護主時內心之驚及無能為力之痛，實是由己心揣度史仲彬念己之心，建文自身對史仲彬的憐恤中包覆著後者思及前者的憂慟。這文意的纏綿也致使唱詞中的「蝴蝶夢」與梁祝故事的聯繫更為緊密。此齣尾聲君臣再次別離時，面對淚如雨下滿心淒慘的史仲彬，建文回應：「和你訂著再世君臣魚共水」。史氏離開後，建文仍不捨思念，獨坐而唱：「淚濕緇衣，長嘆昏和曉。那史徒呵，除非是身逐夢魂飄，和伊日夕相依繞。」¹¹⁶「蝴蝶夢」、「魚水」、「日夕相依繞」，可說明清易代的近期歷史記憶加上戲曲適於抒情的形式共同完成了建文流亡敘事的又一次轉化。面對血腥暴力的歷史記憶，《千忠錄》作者選擇了述寫超越空間阻隔，同心共感，遇困彌堅的纏綿情志，與之抗衡。

本文從分析萬曆朝追諡建文忠臣的論述語境始，繼而追溯建文流亡與隱遁節臣傳聞記錄的演變，終於探討兩條敘事脈絡在《致身》《隨筆》二錄中合流再生的樣貌及其意涵。透過檢視「靖難流亡」主題在不同文字記錄中的流衍變化，筆者希望展現明代士人官方追諡、史料纂輯之外，另一種記憶「靖難」的變形模式。此一模式從記聞、集佚的形式出發，中途卻逸出了此記述形式的局限，踰越虛實分際，以「理想」的敘事取代「符實」的記錄。在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文學與歷史敘事交界處，文字作用的曖昧效應。¹¹⁷從負面來看，建文流亡敘事

¹¹⁶ 《千忠錄》，頁 67。

¹¹⁷ 近期以歷史筆記為材料，並討論歷史與小說之間模糊界限的研究，參見 Stephen H. West, "Crossing Over: Huizong in the Afterglow, or the Deaths of a Troubling Emperor," pp. 565-610.

動人的程度，弔詭地與其忠實程度呈現一種悖反的關係。建文出亡傳說，如實記錄，只能是零星四散的片斷；一旦記述文字不慎涉入書寫者想像筆下人物境遇而投射的情感，其動人的力量便開始作用。文字感發的同時，往往也是脫逸冷凝事實的開始。從正面看，孤立游移的傳聞片斷，未嘗不是由於《致身》、《從亡》之作的牽合整編，才被賦予更深刻完整的意義。敘事的完備與意義的生成，攜手並進。而這意義又是依著晚明特定的政治歷史語境而發生。兩書敘事的賣點和動人之處，皆當就文本與其社會環境對話互動的角度來理解。明亡前嚴正辨偽的錢謙益，當明亡後為趙士喆本乎《致身錄》的《建文年譜》作序，解釋其態度的轉圜：「以宿老如謙益，固亦當援據史乘，抗詞駁正，讀未終卷，淚流臆而涕漬紙」，可說是建文流亡敘事附著人心最力的一種顯示。¹¹⁸

從隱喻的角度來說，歷史記憶也往往是招魂的過程。萬曆年間《致身》、《從亡》二書被接受與流行的環境，與當時朝官文人集體召喚建文及其忠臣英靈的言論、心態和作為息息相關。明代中期相關傳聞記述片段零星，對應於這些游離的文本狀態和浮動訊息，建文記憶及這記憶背後指涉的可能意涵，亦如遊魂飄忽。在各方條件匯集之下，建文流亡想像透過《致身》、《從亡》二書完整的敘事還魂再生。這是就建文記憶的鮮明化與動人化說。而就意義的收編與穩定化而言，兩書建構的情節內容，則具「安魂」作用。建文帝在從亡之臣的護持下歸反大內以終的結局，取代、遮蓋了這位早夭君主實際上更可能死於戰火或逃亡途中種種顛沛的可能。無論是建文帝本身抑或野史中記載散逸各地的隱遁諸臣，成為無人奉祀的無主孤魂，恐怕是更符合其

¹¹⁸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14，〈建文年譜序〉，頁685。相關討論尚可參見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139-161。

實際遭遇的結果。《致身》、《從亡》的美好敘事集君臣亡魂予以一一安置，《從亡隨筆》中環繞建文的節臣牌位如是，建文「回歸大內」的安排亦如是。我們看見：建文流亡敘事的流散或整編，與建文之精魂在歷史時空中的顯隱明滅，相應相依。乾隆四年(1739)殿本《明史》刊布定論《致身錄》「附會不足信」，¹¹⁹此後關乎《致身》、《從亡》的言論相應亦減，建文記憶似復淡去。然近年來史學界對於建文朝史的興趣似正方興未艾，中國大陸各地發展觀光、樹立景點的需要亦賦予地方文史工作者再次召喚建文帝流亡記憶的動機。¹²⁰帝王還魂的故事，到此或許仍非終點？

(本文於 2011 年 11 月 30 日收稿；2012 年 5 月 3 日通過刊登)

*本文寫作與修訂的過程中，多方得益於王鴻泰、王璦玲、胡曉真、黃冠閔、嚴志雄諸位教授，以及三位匿名審查人的評論與建議，特此敬致謝忱。

¹¹⁹ 《明史》，卷 143，〈列傳第三十一〉，頁 4064。

¹²⁰ 一個比較近期的指標是 2010 年 7 月 2 日於南京國際會議大酒店，由中國明史學會、南京鍾山文化研究會主辦，南京明文化研究會、明孝陵博物館具體承辦的「明建文帝國際蹤跡學術研討會」。承蒙師大歷史所何幸真同學提供此一會議訊息，特此致謝。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方瑜，《(嘉靖)南寧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 王士禎，《漁洋精華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 王世貞，《弇州續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牛若麟，《吳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17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
- 王濟，《君子堂日詢手鏡》，收入鄧士龍輯，《國朝典故》，中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王鏊，《王文恪公筆記》，收入鄧士龍輯，《國朝典故》，中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7。
- 史鑒，《西村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史在相編訂，《致身錄》，康熙八年(1669)刻本，線裝善本，藏於上海圖書館。另一同年版本收於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37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 史仲彬撰，《致身錄》，收入曹溶輯，《學海類編》，第3冊，揚州：廣陵書社，2007，清道光晁氏本。
-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9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杜甫著、仇兆鰲註，《杜少陵集詳註》，香港：中華書局，1974。
- 李日華，《李太僕恬致堂集》，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6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李清，《三垣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李賢，《古穰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吳寬，《家藏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汪琬，《堯峰文鈔》，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姜清，《姜氏祕史》，收入《豫章叢書·史部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 姚屢旋等輯，《遜志齋外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8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胡宗憲，《(嘉靖)浙江通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24-26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
- 郁袞，《革朝遺忠錄》，收入《明代傳記叢刊》，第61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徐子超，《千忠錄》，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徐弘祖，《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祝允明，《野記》，收入鄧士龍輯，《國朝典故》，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屠叔方，《建文朝野匯編》，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第 16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3。
- 張芹，《備遺錄》，收入陸楫編，《古今說海》，第 6 冊，臺北：廣文書局，1968。
- 許相卿，《革朝志》，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第 16 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
- 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5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陶奭齡，《賜曲園今是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8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陳繼儒，《晚香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6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焦竑，《澹園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6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黃佐，《革除遺事》，收入鄧士龍輯，《國朝典故》，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黃佐，《革除遺事節本》，收入《明代傳記叢刊》，第 61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 熊開元，《魚山剩稿》，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7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 潘耒，《遂初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潘耒，《松陵文獻》，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41 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潘耒章，《國史考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鄭曉，《臣事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55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鄭曉，《建文遜國臣記》，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 61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鄭曉，《建文遜國紀》，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第 23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3。

鄭曉，《遜國君紀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55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錢士升，《皇明表忠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10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錢士升，《遜國逸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55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錢謙益撰集，《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

薛應旂，《憲章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3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謝肇淛，《滇略》，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聶心湯，《(萬曆)錢塘縣志》，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23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二、 近人論著

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91(臺北，1993)，頁 40-49。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

王崇武，《明靖難史事考證稿》，香港：龍門書店，1969。

王璦玲，〈明末清初歷史劇之歷史意識與視界呈現〉，《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頁 169-285。

王璦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4(臺北，2004)，頁 41-53。

牛建強，〈試論明代建文帝歷史冤案的反正過程——以明中期建文朝史籍纂修為視角〉，《史學月刊》，2(鄭州，1996)，頁 32-38。

包遵彭，〈明史編纂考導論〉，收入黃眉雲等著，《明史編纂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頁 1-8。

吳振漢，〈明代中葉私修國史之風探析〉，《史匯》，6(中壢，2002)，頁 1-21。

吳德義，《建文史學編年考》，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

吳德義，〈《姜氏祕史》考辨及其史料價值〉，《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3(北京，2010)，頁 47-52。

何歌勁，《建文帝落籍湘潭》，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何幸真，〈英廟「盛德」——明天順朝君臣對「建文問題」之態度〉，《明代研究》，16(臺北，2011)，頁 1-28。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正續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林維杰，〈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朱熹對《孟子·萬章》篇兩項原則的詮釋學解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臺北，2008)，頁 109-130。
- 胡適，〈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跋崇禎本《遜國逸書》殘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臺北，1928)，頁 19-23。
- 徐作生，〈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證〉，《史學月刊》，1986：6(鄭州，1986)，頁 24-29。
-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 陸宏輝，〈揭開明代歷史上的一個大謎——從地方志看建文帝失位後的行跡〉，《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3(南寧，1988)，頁 92-95。
- 張一鳴，〈明建文帝下落「新說」質疑——與徐作生同志商榷〉，《曲靖師範學院學報》，12：2(曲靖，1993)，頁 44-49。
- 黃全安、蒙潘孫，〈明代建文帝駐足廣西橫縣寶華山有關史實考據〉，《廣西地方志》，2003：6(南寧，2003)，頁 42-45。
- 楊知秋，〈建文帝出亡雲南新證〉，《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4(昆明，2004)，頁 108-111。
- 管維良，〈地方志是建文帝出亡的歷史見證〉，《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2(重慶，2001)，頁 80-85、95。
- 趙世瑜，〈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 20 世紀的新史學到後現代史學〉，《中國社會科學》，2003：2(北京，2003)，頁 175-188、208。
-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鄭志良，〈《千忠錄》作者考辨——兼與劉致中先生商榷〉，《文學遺產》，2007：4(南京，2007)，頁 96-101。

- 劉致中，〈《千忠錄》作者考〉，《文學遺產》，2003：4(南京，2003)，頁 94-101。
- 謝貴安，〈試論《明實錄》對建文帝的態度及其變化〉，《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8：3(北京，2010)，頁 30-37。
- Ditmanson, Peter. "Venerating the Martyrs of the 1402 Usurpation: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T'oung Pao*, 93:1 (2007), pp. 110-158.
- Ebrey, Patricia Buckl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Halbwachs, Maurice. Lewis A. Coser tran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Hok-lan Chan, "Legitimizing Usurpation: Historical Revisions under the Ming Yongle Emperor (r.1402-1424)," in Philip Yuen-sang Leung ed., *The legitimization of new orders : case studies in world histo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1-129.
- Kansteiner, Wulf. "Finding Meanings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History and Theory*, 41:2 (May 2002), pp. 179-197.
- LaCapra, Dominick. *History and Memory after Auschwitz*.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Mote, Frederick W.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 Taipei: Caves Books, 1988.

The Emperor's Returning Ghost: Transforming the Jianwen Emperor in Ming Dynasty China

Chung-yun Liu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uses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narrative to reexamine two late Ming texts long denounced as “falsified history”—*Zhishen lu* (The Account of Self-Dedication) and *Congwang suibi* (Casual Notes Written while Accompanying the Emperor in Exile)—published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These two works were widely known amo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officials and literati, and significantly reformulate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Jianwen emperor. In this article, I present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obscured memory of a tragically deposed emperor became a fully flesh and blood figure in two fabricated historical narratives. I argue that the formation and popularity of the two texts provide us with a valuable case to investigate the intricate interactions among history, memory, and writing.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rhetoric employed in the memorials submitted to the Wanli court concerning the reinstatement of Jianwen and his martyrs;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Zhishen lu*; and contemporary unofficial histories. I demonstrate that political discourse, readers' reception, and commercial promotion all contribu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the “imagined” history of Jianwen’s exile during the late Wanli period. Next, I trace the formation of these two texts from earlier private historical records, including *biji* (miscellaneous notes).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se sources shows that *Zhishen lu* is the product of its writer collating and editing previous records. Based on *Zhishen lu*, the writer of *Congwang suibi* made further modifications to create an elaborate and moving story of a group of loyalists who followed Jianwen in exile for almost forty years. Finally, I turn to the two texts themselves to analyze the elements that might have appealed to the sensibility of the late Ming readers.

Keywords: *Zhishen lu*, *Congwang suibi*, Jianwen Emperor, historical memory, narrative